

薩摩藩島津氏與清人之交流 ——以喜鶴亭十六景序、詩為例^{*}

沈玉慧^{**}

提 要

1609 年遭薩摩藩出兵征服，1630 年代起江戶幕府施行禁教、「鎖國」政策，琉球因而成為日本取得中國信息、商品的主要途徑之一。此後隨著 1634 年起琉球出使江戶、與清朝宗藩關係確立，琉球亦成清、日交流的途徑。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十七世紀初壟斷琉球途徑的薩摩藩，自十八世紀起也利用長崎途徑與清人交流。其原因除了十七世紀後期以來江戶幕府統治政策轉為文治、十八世紀以來日本對清朝認識逐漸轉變，以及享保改革下江戶幕府放寬異國知識、技術輸入限制等，薩摩藩的內部因素亦不可忽視。為此，本文透過考察十八世紀薩摩藩利用長崎途徑的交流事例，結合前述的時代背景，及薩摩藩的內部因素等，探討薩摩藩島津氏利用長崎途徑對清交流的背景、原因及其意義。

關鍵詞：薩摩藩、島津氏、島津重豪、喜鶴亭十六景、長崎、清日文化交流

* 收稿日期：2023 年 2 月 4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3 年 4 月 12 日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18 世紀中日文化交流網絡——以長崎、琉球途徑為考察中心（計畫編號 MOST 110-2410-H-005-006-MY2）」之研究成果。感謝尚古集成館松尾千歲館長提供〈喜鶴亭十六景圖〉、序及詩之圖像檔案與相關文獻，並同意授權使用圖檔。本文曾於 2022 年 11 月 26 日「東亞文化意象的博物書寫與物質文化」學術研討會上發表，承蒙與會學者提供寶貴意見，並感謝匿名審查人給予本文詳盡的指正與修改建議，惟文責由作者自負。

**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1609 年遭薩摩藩出兵並受其嚴密監管，及 1630 年代起江戶幕府施行禁教、「鎖國」政策後，琉球因而成為日本取得中國信息、商品的主要途徑之一。此後隨著清朝成立，歷經明清交替，琉球與清朝間的宗藩關係逐步確立穩定。¹ 幕藩體制下「異國」的琉球，² 自 1634 年起也開始出使江戶，加上日本對清朝的認識逐漸轉變，³ 遂產生與清人文化交流的興趣，十八世紀初期即可見琉球中介清日文化交流之例。⁴ 自十七世紀壟斷琉球途徑的薩摩藩，於十七世紀中後期起，每年五月中旬到九月下旬，荷蘭船抵達長崎時擔任夏季長崎聞役，⁵ 因此也有機會利用長崎途徑取得清朝的信息、書畫，與清人交流。⁶

就目前所見，薩摩藩利用長崎途徑與清人交流共有三例，分別為第六代加治木家領主島津久徵（1752-1809）利用出身長崎的家臣伊藤瓊山，向清人求取《名山樓詩集》、《名山樓詠物百首》之序跋；⁷ 1787 年薩摩藩主島津重豪（1745-1833，

- 1 除了兩年定期遣使朝貢外，1680 年代起琉球於朝貢使節出使隔年遣使福州接回貢使。參見橫山重等編，《中山世譜》（東京：東京美術，1972），卷 8，頁 123-124。有關清代琉球接貢船制度詳參富田千夏，〈琉球王国接貢制度の研究：清代における「接貢」に関わる人々の往還の一家譜資料を中心に〉（沖繩：琉球大學大学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科比較地域文化專攻博士論文，2014）。
- 2 此是指對幕府歲貢含計於薩摩藩之下的琉球，有別於各大名，無須負擔軍役。史料紀錄見於鹿兒島縣維新史料編纂所編，《舊記雜錄後編（五）》（鹿兒島：鹿兒島縣：1985），卷 87，第 710 號，頁 419-421。
- 3 參見劉序楓，〈從「韃靼」到「大清」：十七、八世紀日本幕府對清朝認識的建構〉，收入劉序楓主編，《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8），頁 97-142。
- 4 代表之例為 1710 年第六代幕府將軍侍講——新井白石，透過琉球取得清翰林院編修鄭任綸為其詩集作序。詳細考察參見劉序楓，〈從「韃靼」到「大清」：十七、八世紀日本幕府對清朝認識的建構〉，頁 109-117；沈玉慧，〈18 世紀經由琉球途徑的清日文化交流〉，《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33 卷第 1 期（2021.3），頁 86-89。
- 5 薩摩藩長崎聞役之相關研究參見上村文，〈薩摩藩長崎聞役——設置の経緯とその役職について〉，《黎明館調査研究報告》，第 16 集（2003.3），頁 79-90。
- 6 除了薩摩藩以外，1686 年鹿島藩第四代藩主鍋島直條之侍臣——並木六郎右衛門存誠，以佐賀藩支藩負責長崎警備之便，透過唐通事前往長崎貿易的清商，詢問清朝的衣食風俗、反清勢力後代等信息，並進行詩畫交流，相關研究參見徐興慶，〈近世中日文化交流探微——以「存誠長崎筆談」為中心〉，《華岡外語學報》，復刊號（1994.5），頁 21-39；井上敏幸，〈日中交流の現場とその遺産——『存誠長崎筆談』の世界〉，收入伊藤昭弘編，《佐賀學Ⅲ 佐賀をめぐる「交流」の展開》（佐賀：佐賀大學地域學歷史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17），頁 80-132。
- 7 高津孝，〈長崎の清人と薩摩の漢詩集〉，收入氏著，《博物學と書物の東アジア：薩摩・琉球と海域交流》（沖繩：榕樹書林，2010），頁 248-261。

在職 1755-1786）透過前唐通事，向清人求取喜鶴亭的景觀詩與序文，並於隔年順利取得，以及 1803 年島津重豪透過來日清醫胡兆新，向清人求取以江戶高輪藩邸庭園為題的詩畫。⁸ 島津久徵與 1803 年的交流事例已有相關研究，1788 年之例則尚未見分析考察。

值得注意的是，壟斷琉球途徑的薩摩藩利用長崎途徑向清人求取詩畫之因，除了十八世紀日本對清朝認識的轉變，及德川吉宗時期（1684-1751，在職 1716-1745）在享保改革下，放寬對異國知識、技術輸入的禁令，進而帶動了與清人的文化交流以外，身為外樣大名，其後甚至成為將軍家外戚的島津氏，除了藩主的個人興趣，是否有其他因素促使島津氏並用琉球、長崎途徑取得清人詩畫？以下將透過考察 1788 年的交流事例，結合前述的時代背景，以及薩摩藩的內部因素等，探討薩摩藩島津氏對清交流的背景、原因及其意義。

二、喜鶴亭十六景圖、序及詩

喜鶴亭為薩摩藩主島津氏位於大磯吉野村海邊庭園——仙巖園內之亭。仙巖園一帶多奇岩，與江西龍虎山的仙巖相似，因而名為仙巖洞。薩摩藩第二代藩主島津光久（1616-1695，在職 1638-1687）獲鎌田之舊宅後，將之規劃為仙巖園，1672 年於園內增建一亭，隔年落成後之宴會，因忽有雙鶴久駐而命名為喜鶴亭。⁹ 四代藩主島津吉貴（1675-1747，在職 1704-1721）自藩主退位後，於該處種植大量櫻花樹，並常於此觀賞四季美景，因而出現以喜鶴亭為中心的周邊景致，並題有喜鶴亭、天神梅、洲崎煙、櫻島月等景觀詩。¹⁰

8 塚本唐充，〈日本の風景を画いた清朝画家：沈桂「亀鶴塲詩画冊」と島津重豪〉，《中国文史論叢》，15 號（2019.3），頁 1-32。

9 山本正誼，《秋水山本正誼遺稿》（鹿兒島：鹿兒島縣立圖書館藏），葉 9-10，〈仙巖園喜十六景圖記〉。同文亦見於山本正誼，《秋水先生文集》（大阪：大阪大學附屬圖書館藏），葉 3-5，〈仙巖園喜十六景圖記〉。国書データベース可線上閱讀全文，參見国書データベース，<https://kokusho.nijl.ac.jp/biblio/100364829/1?ln=ja>（檢索日期：2023 年 4 月）；活字版則收入於井上良幸，《磯乃名所旧蹟》（鹿兒島：井上左恵，1931），頁 46-48。感謝審查委員及尚古集成館松尾千歲館長提供以上資料。

10 本田親孚、平山武毅編，《薩藩名勝志》，收入鹿兒島縣史料刊行會編，《鹿兒島縣史料集（42）》（鹿兒島：鹿兒島縣史料刊行會，2003），卷 1，頁 18-19。除〈仙巖園喜十六景圖記〉與後述同藏於尚古集成館，由薩摩藩藩校教授山本正誼所撰之〈喜鶴亭十六景記〉外，另有〈仙巖喜鶴亭十六景記〉，參見山本正誼，《秋水山本正誼遺稿》，葉 38-39，〈仙巖喜鶴亭十六景記〉；同文亦見於山本正誼，《秋水先生文集》，葉 6-9，〈仙巖喜鶴亭十六景記〉，及井上良

享保十三（1728）年島津吉貴曾令畫師繪製十六景眞景（草圖），向清人求詩，相關記載如下：

本藩仙巖園は府東一里計りにあり，喜鶴亭あり，淨國公（淨國公は二十三代正四位中將吉貴公なり）始世より游觀の地なり，俗には大磯といふ，本府の勝地とす。其朝暉夕陰，氣千變なるもの，具に名狀すべからず，其中十六勝の眞景を寫し，享保十三年戊申の歲に，琉球人歳貢者に託して，唐山各省の名家に，一景一詩を請はしむ。¹¹

據上所述可知，島津吉貴曾透過前往清朝朝貢的琉球使節，向清朝各省知名文人求取喜鶴亭周邊十六處景觀之詩作。唯現僅見上述紀錄，未見十六景圖及 1728 年透過琉球使節向清人所求的景觀詩，因此無法得知琉球使節是否順利達成此次任務。¹²

（一）喜鶴亭十六景圖

據現藏於尚古集成館，¹³ 由當時任職薩摩藩藩校教授的山本正誼（1734-1808）所作的〈喜鶴亭十六景記〉（以下簡稱為〈十六景記〉）可知，第八代薩摩藩主島津重豪因空閒時喜遊喜鶴亭，將喜鶴亭周邊尤具特色的葡萄架、胡枝叢、楓樹岸、蕃蕉丘、修竹徑、赤松林、鳴雨泉、騰蛟石、飛鳥道、龍洞院、菅神廟、櫻花谿、朝夕池、天平島、匹練洲、海門山等處景觀選為十六景，並令畫師繪製

幸，《磯乃名所旧蹟》，頁 48-50。其中〈仙巖喜鶴亭十六景記〉一文中的十六景名與另兩文不同，分別為大宛果、雍門荻、楚江楓、鐵山蕉、淇澳竹、徂徠松、劍峰泉、洞庭石、鳥越道、龍洞院、菅神廟、櫻花谿、朝夕池、天平島、長洲崎、海門嶽。由文中對雍門荻、鐵山蕉、菅神廟、櫻花谿、天平島、海門嶽之描述及各景位置相同，加上《本草綱目》記「大宛以葡萄釀酒」，據此大宛果應為葡萄，則大宛果應與「葡萄架」一景同，可知十六景名稱雖異但所指景色相同。另島津久徵的詩文集《名山樓詩集》中亦有明霞亭、寶字峰、菅相廟、櫻花塢等仙巖園之景觀詩作，據《鹿藩名勝考》記載寶字峰即為櫻島，可知仙巖園的景觀名似並未統一。以上相關記載參見（明）李時珍，《本草綱目》（臺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1976），頁 1077；白尾國柱，鹿兒島縣維新史料編纂所編，《鹿藩名勝考》（鹿兒島：鹿兒島縣史料刊行會，1982），頁 131。

11 曾槃，《仰望節錄：島津重豪》，收入堀田璋左右、川上多助共編，《日本偉人言行資料》（東京：國史研究會，1917），頁 32。

12 塚本麿充〈日本の風景を画いた清朝画家：沈桂「龜鶴塢詩画冊」と島津重豪〉一文以本文所介紹的〈喜鶴亭十六景詩〉為 1728 年琉球使節中介之成果，然實應為 1728、1787 年島津吉貴、島津重豪分別向清人求取喜鶴亭之景觀詩。參見塚本麿充，〈日本の風景を画いた清朝画家：沈桂「龜鶴塢詩画冊」と島津重豪〉，頁 12、19。

13 尚古集成館成立於 1923 年，為收藏島津家約 700 年間，超過一萬件文物的博物館。相關介紹參見田村省山，《尚古集成館——島津氏 800 年の收藏》（鹿兒島：春苑堂，1993），頁 18-20。

兩卷十六景圖，交託已卸任唐通事的林梅卿（1727-1794），¹⁴ 請清人為各景作詩及序。¹⁵

同樣藏於尚古集成館的十六景圖，分別為以喜鶴亭為中心的園內八景圖（圖1，以下稱為〈喜鶴亭十六景圖：園內八景〉），以及由喜鶴亭對岸的櫻島為中心的園外八景圖（圖5，以下稱為〈喜鶴亭十六景圖：園外八景〉），¹⁶ 兩幅圖皆無繪製者、繪製時間等相關記述，唯據〈十六景記〉中提到：「天明丁未之歲，老太守中將公至自東都，暇日遊喜鶴亭者屢矣。因撫其登臨游觀之美，尤可賞者為十六景。命畫師圖其狀」，加上山本正誼於文末落款的時間為「天明七年歲次丁未十有二月」的1787年12月，〈喜鶴亭十六景序〉（以下簡稱為〈十六景序〉）作者錢榮（1742-1799）的落款為「歲在著雍涖灘圉余月穀旦」，¹⁷ 即戊申年（1788）4月，綜上推測十六景圖應繪於1787年。

據山本正誼〈十六景記〉之描述十六景的位置為：

蓋自喜鶴亭而南數步為葡萄架，左轉而東數步為胡枝叢，又東數步為楓樹岸，又東數步為蕃蕉丘，又左轉而北數步為修竹徑，又北數步為赤松林，又左轉而西六十步為鳴雨泉，又西八十步為騰蛟石，皆在園中。自園而西二里為飛鳥道，左轉而南數十步為龍洞院，又南數十步為菅神廟，又南數十步為櫻花谿，皆在園外。而其東南枕大江，是為朝夕池，其中有島焉，是為天平島，有洲焉，是為匹練洲，而其西南二百里許有山，是為海門山。¹⁸

14 之所以透過林梅卿中介此次交流應為1771年島津重豪自江戶返回薩摩藩途中前往長崎並停留20餘天，期間除入荷蘭商館、登荷蘭船、於荷蘭大通詞令村源右衛門屋內招待荷蘭人外，也前往唐人屋敷，並拜訪時任唐大通事的林梅卿（林市兵衛）。林梅卿以林公琰為祖，為唐通事林氏本家第五代，先後歷任稽古通事、小通事、大通事等職，1775年退隱，1782年再度出任唐通事頭取，1785年因開啓外國金銀輸入之路，利於國益，獲任町年寄末席並長崎會所改役。雖島津重豪委託林梅卿時，林梅卿已卸任通事之職，然其出任唐通事一職達四十餘年，並曾出任長崎會所職役，加上其出身於唐通事名門之家——林家，可知即便卸職應仍具有影響力，得以因應島津重豪之託，透過來崎清商請清人作序及詩。以上有關島津重豪與林梅卿間的往來，及林梅卿的經歷參見芳即正，《島津重豪》（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頁40-41；金井俊行，《長崎年表第2》（東京：以文會社，1888），葉6；宮田安，《唐通事家系論攷》（長崎：長崎文獻社，1979），頁358-362。

15 山本正誼，〈喜鶴亭十六景記〉（鹿兒島：尚古集成館藏）。

16 兩圖尺寸分別為寬53.4公分、長246公分；寬53.4公分、長208公分。

17 見於尚古集成館藏〈喜鶴亭十六景詩〉。錢榮〈喜鶴亭十六景序〉及〈喜鶴亭十六景詩〉詩亦見於白尾國柱，鹿兒島縣維新史料編纂所編，《鹿藩名勝考》，19-21頁，及伊藤松，《鄰交徵書》（東京：圖書刊行會，1975），頁512-518。

18 山本正誼，〈喜鶴亭十六景記〉（尚古集成館藏）。雖前引〈仙巖喜鶴亭十六景記〉亦對十六景

由上可知，葡萄架、胡枝叢、楓樹岸、蕃蕉丘、修竹徑、赤松林、鳴雨泉、騰蛟石為位於仙巖園內之八景。其餘之飛鳥道、龍洞院、菅神廟、櫻花谿等則於仙巖園外。根據〈十六景記〉之內容推測園內八景的分布如圖 1。¹⁹ 另如前述〈喜鶴亭十六景圖：園外八景〉是以櫻島為中心遠眺的園外八景，且與圖 1 相同，圖上並無任何浮箋、標記等，不易辨識園外八景的分布，為此僅先參照 1815 年島津重豪下令繪製《薩藩勝景百圖》²⁰ 推測園外八景的分布位置。

如前所述，仙巖園位處大磯吉野村，因此《薩藩勝景百圖》第 2 景（圖 2）右下方之大磯邸即為仙巖園。²¹ 圖中可見園內八景之一的鳴雨泉，²² 因騰蛟石位於鳴雨泉旁不遠處，則千尋巖即為騰蛟石。其餘亦可見園外八景與《薩藩勝景百圖》標記名稱不同之處，如菅神廟記為天滿宮，朝夕池記為田之浦，另天平島、匹練洲、海門山於《薩藩勝景百圖》第 1 景（圖 3）中則分別記為櫻島、洲崎及開聞岳。

菅神廟應為祀奉菅原道真的天滿宮。菅原道真遭左遷至九州大宰府後抑鬱而終，而後因醍醐天皇之皇子相繼病死，及造成眾多傷亡的平安京清涼殿落雷事件等，遂出現菅原道真怨靈作祟之說，並為此建立北野天滿宮以鎮菅原道真怨靈，後更賜與「北野天滿宮天神」之號，菅原道真亦因此被稱為「天神樣」。²³ 因此，〈十六景記〉中所稱之菅神廟，與《薩藩勝景百圖》中所記之天滿宮應為同一處，即為今日的大磯天神菅原神社。

位置有相關描述，然除對櫻花谿、匹練洲、朝夕池、海門山距離喜鶴亭的具體里數以外，其餘描述則為較籠統之「亭前步行若干步」、「在亭後若干步」，為此，本文主要根據〈喜鶴亭十六景記〉推測十六景之具體位置所在。

19 感謝尚古集成館松尾千歲館長提供資料協助推測考察。

20 引自「日本近世生活繪引」南九州編纂共同研究班，《日本近世生活繪引：南九州編》（橫濱：神奈川大學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非文字資料研究センター，2018），頁 4，另景觀地點之考證見於該書頁 22-23。圖上有浮箋標示出大磯、龍洞院、天滿宮、田之浦等景，此處轉引因未能清楚顯示以上各景位置，為便於辨識，連同鳴雨泉、朝夕池及該書考證之千尋巖、櫻谷（櫻花谿）、大磯邸等皆標記於圖上。

21 五代秀堯、橋口兼柄編，《三國名勝圖會》（東京：山本盛秀，1905），卷 2，葉 7-11。另井上良吉《磯乃名所旧蹟》中亦可見「磯邸一名仙巖園」的描述，參見井上良吉，《磯乃名所旧蹟》，頁 42-43。

22 鳴雨泉為仙巖園旁山林中的水流宣洩而下的小型瀑布，也稱為「時雨之滝」，寬政年間（1789-1800）於千尋巖旁設有觀水舍，可近觀其景。鳴雨泉、觀水舍、千尋巖之相關圖繪及介紹見於五代秀堯、橋口兼柄編，《三國名勝圖會》，卷 2，葉 7、9。

23 森公章，《天神樣的正休：菅原道真的生涯》（東京：吉川弘文館，2020），頁 194-209。〈仙巖園喜十六景圖記〉亦可見相關描述，見於山本正誼，《仙巖園喜十六景圖記》，頁 49。

據〈十六景記〉：「自園而西二里爲飛鳥道，左轉而南數十步爲龍洞院，又南數十步爲菅神廟，又南數十步爲櫻花谿，而其東南枕大江，是爲朝夕池，其中有島焉，是爲天平島，有洲焉，是爲匹練洲。」則自菅神廟往南即爲櫻花谿。又據「元祿國繪圖薩摩國」（圖4）中所標示的方位，即仙巖園外的櫻島爲東方，仙巖園外往下延伸的薩摩半島爲南方，加上《三國名勝圖繪》描述鹿兒島八景之一的田之浦爲「薩隅二州の腹に入り、一大内海となり、湖の如し」，²⁴則朝夕池應爲位於櫻花谿東南方的田之浦。櫻島位於田之浦外海，因此天平島即爲櫻島。圖3中可見櫻島附近有一沙洲標記爲「洲崎」，加上匹練爲成匹長幅白絹之意，或與遠眺的沙洲——洲崎之景觀相似，推測匹練洲爲洲崎。²⁵又〈十六景記〉中寫道「匹練洲而其西南二百里許有山，是爲海門山」。由於開聞岳位於錦江灣外海，即海門處，加上開聞與海門的日文讀音皆爲 kaimon，因此開聞岳即爲十六景之海門山（圖3）。雖《薩藩勝景百圖》與喜鶴亭園外八景繪製的視角不同，然根據以上對於園外八景致的描述，推測園外八景於尙古集成館藏〈喜鶴亭十六景圖：園外八景〉中的分布如圖5所示。

（二）喜鶴亭十六景序、詩

〈喜鶴亭十六景序〉的內容主要說明十六景詩成立之因，即薩藩自豪仙巖十六勝景，令畫師繪製成圖，由於清日商貿往來頻繁，遂尋訪清朝學士作詩，並由錢棨爲其寫序，置於〈十六景詩〉之首（圖6-1）。錢棨的序文之後，依序爲嵇璜（1710-1794）、王昶（1725-1806）、李紱（生卒年不詳）、王文治（1730-1802）、顧宗泰（1749-1829?）、蔣元益（1708-1788）、彭紹觀（生卒年不詳）、梁同書（1723-1815）、嚴福（1738-1792）、范來宗（1737-1817）、汪如洋（1754-1794）、吳俊（1744-1815）、曹謙光（生卒年不詳）、董誥（1740-1818）、金士松（1729-1800）及江琅（1736?-1794?）等十六人爲各景各作一詩（以下簡稱爲〈十六景詩〉，圖6-2~6-5）。²⁶

序、詩的作者皆爲清人並多任有官職，由於各詩並無標記時間的落款，如以〈十六景序〉的落款時間——1788年4月爲參考依據，則1788年前後連同錢棨在

24 五代秀堯、橋口兼柄編，《三國名勝圖會》，卷2，葉11。另1843年刊行的《三國名勝圖會》卷1，「大磯」除記載喜鶴亭由來外，亦可見標記千尋巖、龍洞院、天滿宮、櫻谷等處的圖繪。

25 另據尙古集成館考證匹練洲的讀音爲 susaki，與洲崎相同，因此匹練洲即爲洲崎。

26 感謝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高明一老師協助判讀部分詩作、鈐印。

內十七人的官職分別為尙書房行走（錢榮）、文淵閣大學士（嵇璜）、雲南布政使（王昶）、湖廣道御史（李燾）、²⁷起居主事（顧宗泰）、翰林院編修、內閣侍讀學士（嚴福）、雲南學政（汪如洋）、²⁸戶部尙書（董誥）、及吏部右侍郎、順天學政（金士松）等。另，曾任內閣學士、兵部右侍郎的蔣元益自 1778 年後未再任官；1763 年因父喪返鄉後的梁同書，1807-1815 年期間具侍講學士銜，返鄉前曾任翰林院編修、起居注官等；范來宗、王文治雖皆未見 1788 年前後的任官紀錄，但皆曾任翰林院編修；江琅於 1782 年出任福寧知府後卒於福建；1757 年進士的彭紹觀於 1779-1784 年期間曾任翰林院侍講學士，國朝貢生曹謙光則未見任官紀錄。²⁹

由上可知，十七名清人中多為翰林院編修或地方官員，甚至可見戶部尙書之高層官員。若此次的交流屬實，則究竟是如何促成此次的交流活動。首先，關鍵的中介人物或為朱芝岡，因山本正誼的〈十六景記〉落款後可見朱芝岡之鈐印（圖 7）。朱芝岡於 1788 年前往長崎時，曾為薩摩藩內第六代加治木家領主島津久徵³⁰的《名山樓詩集》作序。其經緯為 1784 年島津久徵透過出身長崎的家臣伊藤瓊山（1752-1823）³¹求序於汪庚，汪庚因其父親曾因公赴日，與當地賢士多有交流，因而接受委託撰寫序文，再託其妹婿沈琬綸帶回日本。³²朱芝岡則是 1787 年路經

27（清）蘇樹蕃編，《清朝御史題名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76，據清光緒間刊本影印），頁 330。

28《鹿藩名勝考》中收錄吳俊之詩的署名官職為雲南學政、汪如洋為翰林院修撰，如後述藏於尚古集成館的〈十六景詩〉未記十六人的官銜，據《清實錄·清高宗純皇帝實錄》記載吳俊於乾隆五十一年（1787）年 9 月去雲南學政一職，同年 12 月翰林院修撰汪如洋接任雲南學政（〔清〕慶桂等修，《清實錄·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1264，乾隆五十一年九月辛未條、卷 1270，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條），內閣大庫檔案亦可見吳俊於隔年六月繳回任職敕書。參見《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禮科為恭繳敕書事·據雲南學政曹錫齡四川學政錢樾貴州學政陳本忠廣東學政平恕均任滿繳回原領敕書共肆道又雲南學政吳俊丁憂繳回原領敕書壹道共伍道相應移會內閣典籍廳查收〉，登錄號：196735。

29 十七人之任職履歷主要根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建置之「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庫」、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檔案檢索系統，及文集、自傳等查詢確認。參見《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庫》（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清代檔案檢索系統》（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30 島津久徵與第八代薩摩藩主島津重豪為堂兄弟。

31 據「伊藤瓊山先生墓表」（收入重野安繹，《成齋文初集 三》〔東京：富山房，1898〕）所載，伊藤瓊山之父伊藤隆景為筑前人，伊藤瓊山則長住長崎，自幼前往各地遊學，與中井竹山、岡野子玄、熊坂台州等人交遊往來，二十四歲時獲島津久徵延攬，教育久徵之子，並協助建設鄉校毓英館。有關伊藤瓊山的生平另參見高津孝，〈長崎の清人と薩摩の漢詩集〉，頁 254-256；丹羽謙治編，《令和元年度 鹿兒島大學附屬圖書館貴重公開中央圖書館オープン 25 周年記念「平成」新収未公開貴重書展》（鹿兒島：鹿兒島大學附屬圖書館，2019），頁 10。

32 汪庚，〈名山樓詩集序〉，收入島津久徵，《名山樓詩集》（鹿兒島：鹿兒島大學附屬圖書館玉里

杭州時順訪汪庚，因而得以閱覽《名山樓詩集》，隔年前往長崎商貿，於唐人屋敷內作序，³³其序文末「樂圃後裔」、「名衡字芝岡」的鈐印，³⁴與〈十六景記〉的鈐印相同。1790、1792年朱芝岡皆以船頭的身分前往長崎商貿，³⁵其中1790年再為收錄島津久徵於1787-1807年期間詩作的《名山樓詠物百首》作序，³⁶因此極可能是朱芝岡於1788-1792年往來長崎期間協助取得〈喜鶴亭十六景序·詩〉。

另據長島藩主增山雪齋之家臣——春木南湖於1788年9、10月期間前往長崎，與張秋穀、費晴湖等清商的交流紀錄《西游日簿》中可見「姓朱名衡，字芝岡，號味梅，畫人」³⁷之記載。錢泳《履園叢話》中則有「長洲蔣時菴少馬尊甫篁亭先生，生而聰穎……乾隆中，公姪芝岡公，名衡，官江西糧道，署藩臬篆」。³⁸〈十六景詩〉的作者之一蔣元益出身長洲，號時庵（菴），因此「蔣時菴」即為蔣元益。另《履園叢話》中提到蔣元益之父——蔣杲（1683-1731）號篁亭，其

文庫藏），葉2b-4a。

33 《名山樓詩集》中除了朱芝岡以外，另收錄了汪庚、樊硯雲、吳鳳詔、沈琬綸等人的序跋，詳細考察參見高津孝，〈長崎の清人と薩摩の漢詩集〉，頁248-261。其中樊硯雲的跋文中寫道：「（前略）僕雖海洋遠隔未接芳徽，而舟楫相通得窺佳咏。」可知該篇跋文寫於中國。據汪啓淑所著〈樊紹堂傳〉中可見，樊硯雲曾隨其為國學生的父親——樊質煌前往長崎貿易，途中作詩歌成卷，返航途中遭風漂至薩摩藩。停留薩摩期間薩人求詩畫，其所作詩畫倍受珍藏。隔年返國後詩畫似更為精進，太守胡鑒泉延攬樊硯雲擔任書記官——記事，袁枚亦賞識其詩文並收為門人。樊硯雲因體弱多病，自恐不久於人世，1794年初秋作慰別詩十二首後，尋即離世。樊硯雲或因曾遭風漂流至薩摩藩，因而促成了撰寫跋文的機緣。另袁枚《隨園詩話》中亦可見：「吳門樊紹堂，善隸書，能畫，工篆刻，年三十而亡。詩稿散失，僅記其〈別隨園〉一絕云：『西向倉山謁我師，離魂渺渺有誰知。真空悟徹三千界，待索靈根再學詩。』」另篇潘奕雋所作「樊處士硯雲傳畧」內容大致相同，唯其中記樊硯雲卒年僅三十四歲，據此推算樊硯雲的生卒年應為1761-1794年。以上有關樊硯雲生平之相關紀錄參見（清）汪啓淑，《續印人傳》，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09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年海虞顧氏刻本），頁112；（清）袁枚，《隨園詩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70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上海圖書館藏乾隆十四年刻本影印），補遺卷8，頁600；（清）潘奕雋，《三松堂集》，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9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嘉慶道光遞刻本影印），頁346-347。

34 朱芝岡，〈名山樓詩集序〉，收入島津久徵，《名山樓詩集》，葉6a。

35 中村質、劉序楓，〈日本來航唐船一覽——明和元～文久元（1764～1861）年〉，《九州文化史研究所紀要》，第41號（1997.3），頁60-61。另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所藏之「配銅証文」可見寬政四（1792）年朱芝岡兩度以船頭之身分持牌前往長崎貿易之紀錄。此外，亦可見1792年朱芝岡留下畫贊之記錄，該畫贊作品現藏於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

36 《名山樓詠物百首》中尚有呂宏昭之跋，費晴湖對該書進行評比，朱淡庵、楊啓昆參與校訂、謄寫等紀錄，然據高津孝〈長崎の清人と薩摩の漢詩集〉一文之考證，查無朱淡庵、楊啓昆兩人之相關記載。參見高津孝，〈長崎の清人と薩摩の漢詩集〉，頁253。

37 春木南湖，《西游日簿》（東京：日本國會圖書館藏），葉12。

38 （清）錢泳，《履園叢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13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十八年述德堂刻本影印），卷15，頁228。

姪——芝岡的字號與《西游日簿》所記相同，可知《履園叢話》中所記蔣杲之侄應即為朱芝岡。

另，蔣元益的《時庵自撰年譜》中亦可見朱芝岡的相關紀錄。1737年，時年二十七歲的蔣元益請益其師時，適遇從弟芝岡亦學於其師，因而逐漸親交。³⁹此後，1763、1765年蔣元益與朱芝岡亦曾往來，1767年2月朱芝岡於南汝監司降調時曾前往拜訪蔣元益，停留至端午前離去。⁴⁰又如由現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的蔣元益〈行書七言聯〉（圖8），其中的落款、鈐印與蔣元益於〈十六景詩〉的落款及印（圖9）相近，由此推測蔣元益所題〈十六景詩〉為真跡的可能性極高，則朱芝岡或利用其與蔣元益間的親族往來關係委其為喜鶴亭景致題詩。此外，由〈喜鶴亭十六景序·詩〉十七名作者的詩文集中可見，蔣元益與錢榮、顧宗泰、范來宗皆曾詩文交遊，顧宗泰亦與王昶、錢榮、董誥、王文治、梁同書、金士松、吳俊、李榮、范來宗、嚴福等人具直接或間接的交遊關係，因此亦不排除朱芝岡以其與蔣元益的親族關係，再透過蔣元益、顧宗泰的交遊網絡，促成〈喜鶴亭十六景序·詩〉。

雖就目前所見，清朝官員為日人書畫作品寫下序文、畫贊之例，僅見1714年翰林編修鄭任鑰為幕府儒官新井白石的詩作作序，⁴¹及1720年徐葆光於薩摩藩御用畫師木村探元自畫像留下畫贊。其背景為幕府儒官、薩摩藩利用琉球赴清朝貢，及清朝冊封使節赴琉時，琉球與之建立的交流網絡所促成的交流事例。⁴²則僅憑朱芝岡一人利用與蔣元益的交遊關係是否能完成此任務，即便朱芝岡於1788年蔣元益逝世前成功求取詩作，⁴³亦未必能於同年成功取得其他十六名清朝官員的序

39（清）蔣元益，《時庵自撰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98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頁377。《履園叢話》中記朱芝岡為蔣元益之父蔣昊之姪，由「姪」亦具有統稱親緣關係疏遠的子姪輩或故舊摯友之子之意，加上蔣昊為知名的藏書家，且為知名校勘學者何焯的門生，交遊廣闊。因此不排除蔣昊與朱芝岡之間或不具親緣關係，叔侄之稱僅為兩人交遊、師門網絡下表示長幼關係之意。有關蔣昊之藏書及其何焯往來之相關研究參見仇京家，《蔣杲藏書、校書事略考述》，《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5年12月，頁49-53。

40（清）蔣元益，《時庵自撰年譜》，頁423、430、449。

41 劉序楓，〈從「韃靼」到「大清」：十七、八世紀日本幕府對清朝認識的建構〉，頁109-117；沈玉慧，〈18世紀經由琉球途徑的清日文化交流〉，頁86-89。

42 沈玉慧，〈18世紀經由琉球途徑的清日文化交流〉，頁89-100。

43 《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庫》中記蔣元益卒於1778年，唯《吳縣志》則記「戊申卒於家，年八十一」（吳秀之等修、曹允源等纂，《吳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民國二十二年鉛印本〕，卷68，頁1242），即1788年卒。

文與詩。⁴⁴

唯朱芝岡曾參與《四庫全書》的編纂，⁴⁵ 加上乾隆四十七（1782）年《四庫全書》編纂完成後，另編之《四庫全書簡明日錄》中可見嵇璜、董誥、金士松、彭紹觀、汪如洋、錢棨、嚴福、范來宗、李燦、吳俊、顧宗泰等人參與勘閱繕校，⁴⁶ 則亦不排除朱芝岡運用《四庫全書》的編纂經歷，向嵇璜等人取得〈喜鶴亭十六景序·詩〉之可能性。

另值得注意的是，〈喜鶴亭十六景序·詩〉後亦收入於 1795 年成立，由白尾國柱（1762-1821）⁴⁷ 編纂的《覽藩名勝考》（以下簡稱為「覽喜」），然其中的詩作順序及內容等，與尙古集成館的〈喜鶴亭十六景序·詩〉（以下簡稱為「尙喜」）多有出入，包括 1. 順序不同；2. 部分詩名、詩作內容不同；3. 「尙喜」的詩作作

44 值得注意的是，1834 年錢泳曾為尾張藩儒者鈴木肱的《離屋集初編》作序，序文中提到錢泳自長崎清商見到尚未刊刻的《離屋集初編》因而為之作序，另亦提及已有日本著書流入清朝（〔清〕錢泳撰，鈴木肱學會編，《離屋集初編》〔愛知：鈴木肱學會，2010〕，〈讀離屋集初編即題其上並序〉，頁 3-5。該序文亦見於〔清〕錢泳，《登樓雜記（一）》〔南京：鳳凰出版社，2021〕，頁 180，唯無落款）。另錢泳與 1835-1846 年期間以船頭、財副之身分多次前往長崎的沈萍香具姻親關係，為其傳遞日本訊息，相關研究參見蔡毅，〈長崎清客與江戶漢詩——新發現的江芸閣、沈萍香書簡初探〉，《清華學報》，第 34 卷第 1 期（2004.6），頁 103-222；唐權，〈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書翰集』について〉，收入武內惠美子編，《近世日本と樂の諸相》（京都：京都市立藝術大學日本伝統音楽研究センター，2019），頁 201-220。此外，後述梁同書告老返鄉，年過九十仍受託為日人題字作序跋，加上前述汪庚之父汪啓淑為著名藏書、金石學家、篆刻家。以鹽商致富，並捐官為工部司郎中，與當時文人多有往來，乾隆年間編修《四庫全書》時，汪啓淑獻書六百多種，汪庚為父代勞呈送四庫館書，為浙江三大獻書者之一並獲乾隆皇帝褒獎，在日本亦有知名度。汪氏家族的人脈與其在日的交遊亦是促成清日交流不可忽視的網絡。有關汪啓淑之相關研究參見王振忠，〈清代藏書家汪啓淑的商業經營與社會生活——對幾份新見契約文書的解讀〉，《學術月刊》，第 51 卷（2019.1），頁 164-184。綜上可知，長崎清商或有一促成清日文化交流活動的網絡，因此如後述朱芝岡亦可能透過清人網絡成功求取部分詩作。

45 朱芝岡於《名山樓詩集》的封面的頭銜為「翰林院校錄」，序文中則為「翰林院四庫全書校錄」，另於 1790 年與長島藩主增山雪齋之家臣十時梅屋筆談中曾記「蓋自童子時應試以來屢困場屋，弱冠攜笈遊京師，雖從事館閣，而素以唯唯下人為恥」（十時梅屋，《崎陽筆語》〔大阪：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藏〕，葉 13）。相關考察參見高津孝，〈長崎的清人と薩摩の漢詩集〉，頁 251-252。

46 （清）于敏中輯，《欽定四庫全書簡明日錄》，收入嚴靈峯編輯，《書目類編（三）》（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據清同治間黎永椿等校刊本影印），頁 953-995。

47 白尾國柱為江戶時代中後期薩摩藩知名的國學者、考古學者，原為本田親昌之二男，1790 年收為白尾國倫之養嗣子，改名為白尾國柱。1792 年編著《神代山陵考》，後為修訂該書之誤，1795 年編著《鹿藩名勝考》，1799 年獲命仕於薩摩藩在江戶之藩邸，1801 年學於國史館，1804 年與曾榮共同編纂農業百科事典《成形圖說》。有關白尾國柱的生平詳參白尾國柱、鹿兒島縣維新史料編纂所編，《鹿藩名勝考》，〈白尾國柱略伝〉，頁 8；池畑耕一，〈薩摩の考古學者 白尾國柱〉，《黎明館調查研究報告》，第 2 集（1988.3），頁 1-23。

者未註記官職名，「覽喜」則記有官職名；4.「尚喜」的詩名前記有「右詠」、「右題」，寫於詩作之後，「覽喜」的詩名則於詩作之前。另「尚喜」有鈐印，「覽喜」則無，兩者之差異整理如附表一，具體說明如下：⁴⁸

1. 順序不同：「覽喜」與〈十六景記〉中所記十六景之順序相同，皆以喜鶴亭為中心由園內八景向外延伸至園外八景，「尚喜」的〈十六景詩〉順序主要由園外向園內敘詩。

2. 部分詩名、詩作內容不同：由附表一可知「覽喜」中的騰蛟石、天平山、海門山，於「尚喜」則為千尋巖、養老山、枚聞山。前述騰蛟石亦可見記為千尋巖，因此騰蛟石與千尋巖為同景。另因海門山上有成立於平安時代的枚聞神社，加上《覽藩名勝考》中所記田浦六景之一為「枚聞雪」，其描述為「莫將富士低昂去」，⁴⁹即枚聞雪景勝過富士山。此外，同書卷四的開聞神山項中亦可見枚聞山之內容，⁵⁰且兩詩內容相同，則枚聞山即為海門山。天平山與養老山雖詩名不同，但詩作內容相同。⁵¹

另，「尚喜」中未見葡萄架、萩蒿叢、⁵²蕃蕉丘、鳴雨泉、修竹徑、飛鳥道，反之則有式志菴、八幡廟、千葉蓮、大沙川、觀水榭、望嶽樓等詩。其中仙巖園內設有望嶽樓，此為島津光久任藩主期間由琉球致贈磚瓦建造而成，是一可遠望櫻島的亭子，現亦存於園內。其位置即位於喜鶴亭東側池子旁，由此處亦可隔海遠眺櫻島，加上詩中提到「突兀孤峰壓二州」，推測所描述的應為由望嶽樓望向櫻島的景致。另觀水榭應亦為描寫鳴雨泉之詩，唯式志菴、千葉蓮、大沙川皆未見於薩摩藩地誌等，現階段無從考證詩中所描述的景觀為何。⁵³

48 第4點應為出版刊行時考量編排之故所造成的差異。此外，慶喜中記嚴福、梁同書之名為嚴神、梁同，蕃蕉丘、修竹徑則記為番蕉邱、脩竹徑等。

49 白尾國柱，鹿兒島縣維新史料編纂所編，《慶藩名勝考》，頁19。

50 白尾國柱，鹿兒島縣維新史料編纂所編，《慶藩名勝考》，頁81。

51 天平山與〈十六景記〉所記天平島為同景。

52 如前所述，喜鶴亭十六景之景名多有別稱，「萩蒿叢」於〈十六景記〉中記為「胡枝叢」，然在〈仙巖喜鶴亭十六景記〉則記為「雍門萩」，據其說明可知為同一景。相關描述見井上良幸，《磯乃名所旧蹟》，頁49。

53 然值得注意的是，如由「望嶽樓」一詩確實描繪自望嶽樓遠眺隔岸櫻島之景色，另《薩藩勝景百圖》的第2景中可見「八幡宮」，加上式志菴、八幡廟、千葉蓮、大沙川等詩作內容具體明確，則不排除是據其他畫作做詩。

由於「尙喜」的望嶽樓、式志菴、八幡廟、千葉蓮、大沙川、觀水榭等詩作內容與「覽喜」完全不同，加上 1787 年島津重豪選定十六景並令畫師作畫，委由林梅卿透過朱芝岡請清人寫詩作序，山本正誼於同年十二月寫記，錢榮則於隔年四月作序，雖十六景的作者並未留有相關時序紀錄，然如據上述的時間序列，自島津重豪選定十六景至〈十六景序、詩〉完成，約莫一年的時間，如此次交流為真，則反映出清日間交流網絡之發達。然連同錢榮在內十七人的詩文著作中，皆未見對於此次交流的相關描述，加以 1757 年曾發生「日本大學頭默曾迦」透過前往長崎貿易的清朝商人欲與吳中七子唱酬交流，卻遭七子之師的沈德潛（1673-1769）拒絕，改由清人偽作回贈之事件，⁵⁴ 其中十六景詩的作者之一王昶，即為吳中七子其中一人。唯如〈十六景序、詩〉為偽作，則何以不完美地依據山本正誼〈十六景記〉中之景名依序作詩。⁵⁵ 值得注意的是，由 1795 年出版的「覽喜」完美地根據山本正誼〈十六景記〉中所記之景名及其順序編排，並且幾乎完美地搭配十七人於 1788 年前後的任職，此一意圖性之舉應與下節所述，與薩摩藩島津氏和清人交流之意圖有關。

三、薩摩藩島津氏與清人交流之背景與意義

十八世紀以來薩摩藩島津氏多次利用琉球、長崎途徑向清人求取序文、詩畫等，則值得關注的是，其意圖究竟為何，究其原因或與薩摩藩欲提升國內的地位、改變士風有關。

54 詳細分析討論參見陳曦鐘，〈關於「大學頭」及其他——《七子詩選》流傳日本考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1 卷第 6 期（2004.11），頁 94-101；陳曦鐘，〈再談高彝與《七子詩選》——《關於「大學頭」及其他》補說〉，《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3 卷第 1 期（2006.1），頁 82-88。

55 如前所述，〈喜鶴亭十六景圖·序·詩〉上的相關信息過少，加上相關史料記載有限，就現階段而言雖難以斷定〈喜鶴亭十六景序·詩〉的真偽，唯如同此節中所推測，17 世紀中期以來，清日間往來頻繁，且朱芝岡、蔣元益的交遊網絡皆為促成此次交流的有利因素，加上蔣元益的落款字跡與現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字畫落款、鈐印相似，因此〈喜鶴亭十六景序·詩〉為真跡的可能極高。然錢榮於〈十六景序〉落款官職與其 1787 年任尚書房行走之紀錄不符，因此亦無法排除部分偽作的可能性。唯值得注意的是，收入於《鹿藩名勝考》的曹謙光「鳴雨泉」之詩名記有「戊申仲夏」即 1788 年，朱芝岡為《名山樓詩集》作序的落款記為「乾隆五十三年歲次戊申中秋日於崎陽館舍」，因此如前所述不排除朱芝岡於 1788 年取得部分詩作。對此，如能掌握十七人同時期的書畫作品，比對其落款字跡、鈐印，或可進一步釐清。唯現囿於史料所限，此將作為日後課題持續查找考察相關史料文獻。

關原之戰時加入西軍石田三成陣營的島津氏，雖於戰後獲東軍之首的德川家康（1542-1616）予以寬容處置，保全其領地，⁵⁶然屬外樣大名的薩摩藩，於江戶幕府成立初期與德川政權間的關係仍較為疏離，唯其領地石高與同為外樣大名的加賀藩、仙台藩分屬前三位，伴隨著武家官位自公家分離，發展為由幕府主導大名官位敘任的武家官位制後，1664年幕府改對全國大名頒布確認大名領地及所轄統治權的領地判物、領知朱印狀及領知目錄，於新頒發的領知上記各藩主官位，由此確立以將軍為頂點的位階序列。⁵⁷其中領地石高分屬前三位的加賀藩、薩摩藩、仙台藩的藩主官位為從四位，然1702年加賀藩主世子前田吉德（1690-1745）獲敘正四位，因而促使第四代薩摩藩主島津吉貴積極爭取晉升官位，⁵⁸並於1714年成功地敘至正四位，其方法為利用琉球出使江戶。

首先，島津吉貴雖於1704年12月以將軍綱吉納家宣為養子，要求幕府允許琉球遣使慶賀，隔年幕府以無此前例為由拒絕，⁵⁹1709年將軍綱吉崩逝，吉貴表示以低於先代藩主——光久、綱貴中將官位的從四位少將，不易支配琉球，恐因此影響將軍武威，⁶⁰加上琉球為清朝僅次於朝鮮，位處第二的朝貢國，且新任琉球國王即位前，清朝派遣翰林學士及大批武官前來冊封，則琉球遣使江戶慶賀將軍襲位，將有助於增添將軍武威。⁶¹為此，琉球順利遣使江戶，島津吉貴也因此由從四位下左近衛少將，晉升至從四位中將。⁶²1713年第七代將軍家繼襲位，隔年琉球再度派遣使節慶賀，此次的琉球使節身著琉裝，使節稱號也由御使者、附役改為正使、副使，並由久米村人出任掌翰使等職，演奏明清樂等，更進一步強化琉球

56 山本博文，《島津義弘の賭け》（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1），頁273-276。

57 相關研究參見李啓煌，〈近世武家官位制の成立過程について〉，《史林》，74卷6號（1991.11），頁44-74；堀新，〈近世武家官位試論〉，《歷史學研究》，703號（1997.10），頁90-99。

58 相關研究參見紙屋敦之，《大君外交と東アジア》（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頁139-141；林匡，〈島津吉貴の時代〉，《黎明館調查研究報告》，第21集（2008.3），頁1-50。

59 鹿兒島縣維新史料編纂所編，《舊記雜錄追錄（二）》（鹿兒島：鹿兒島縣，1973），卷35，第1943、1944號，頁567。

60 鹿兒島縣維新史料編纂所編，《舊記雜錄追錄（二）》，卷41，第2764號，頁827-828；詳細考察參見木土博成，〈宝永正徳期の幕薩琉關係〉，《日本史研究》，第703號（2021.3），頁93-100。

61 鹿兒島縣維新史料編纂所編，《舊記雜錄追錄（二）》，卷41，第2756、2764號，頁822-825、827-828。

62 鹿兒島縣維新史料編纂所編，《舊記雜錄追錄（二）》，卷44，第3003、3007號，頁924、925。

的異國、中華風貌，⁶³ 島津吉貴再度以率領琉球使節赴江戶慶賀有功，晉升至正四位下中將。⁶⁴

另值得注意的是，四代將軍家綱（1641-1680，在職 1651-1680）襲位後一改過往嚴厲的統治政策，改採文治政治，重視學問，獎勵儒學，繼任的綱吉（1646-1709，在職 1680-1709）、家宣（1662-1712，在職 1709-1712）也繼之推行，如 1683 年頒布的「武家諸法度」第一條即由武士應專嗜弓馬之道，⁶⁵ 改訂為「應勵文武忠孝，正儀禮」，⁶⁶ 並於 1690 年建置湯島聖堂，以林信篤任大學頭，1710 年再度改訂的武家諸法度指出武士應「修文武之道，明人倫，正風俗」。⁶⁷ 由此可知，自十七世紀後期以來，江戶幕府的統治核心概念，由武治逐漸轉變為文治，並推崇源自於中國的儒教。

自 1683 年明鄭降清以來，經由唐通事翻譯自前往長崎貿易商人間訊情報的《唐船風說書》中，對清朝的稱呼由「韃靼」逐漸轉變為「大清」，⁶⁸ 至 1720 年代，隨著清朝的統治逐漸穩固，幕府對於清朝制度風俗等亦感興趣，如幕府曾向前往長崎的朱佩章詢問清朝的服制、喪葬、法令、文藝風俗等，其中除提及康、雍兩帝整肅貪官汙吏、體恤民情、善用人才等，對於清朝統治予以好評外，⁶⁹ 亦談及衍聖公之職。⁷⁰ 約莫同一時期的來崎清商問答紀錄《華客答問錄》亦記載了清朝的風俗、出海商貿管理制度、中日航路、鄭氏子孫、官制等，⁷¹ 其中可見以下問答

63 參見宮城榮昌，《琉球使者の江戸上り》（東京：第一書房，1982），頁 101-165。

64 鹿兒島縣維新史料編纂所編，《舊記雜錄追錄（三）》（鹿兒島：鹿兒島縣，1973），卷 49，第 426-429 號，頁 172-174。相關研究參見紙屋敦之，《大君外交と東アジア》，頁 139-141；林匡，〈島津吉貴の時代〉，頁 16-17。

65 「文武弓馬之道，專可相嗜事。左文右武，古法也，不可不兼備矣。弓馬是武家之要樞也，號兵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治不忘亂，何不勵修練乎。」參見高柳真三、石井良助編，《御觸書寬保集成》（東京：岩波書店，1934），頁 1。此條內容於 1615 年頒布。

66 「文武忠孝を勵し可正礼儀事」，參見高柳真三、石井良助編，《御觸書寬保集成》，頁 8。

67 「文武の道を修め、人倫を明かにし、風俗を正しくすべき事」，參見高柳真三、石井良助編，《御觸書寬保集成》，頁 9。

68 劉序楓，〈從「韃靼」到「大清」：十七、八世紀日本幕府對清朝認識的建構〉，頁 109-117。

69 不著撰人，《清朝探事》，收入大庭脩編，《享保時代の日中關係資料二——朱氏三兄弟集》（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1995），頁 111。另參見劉序楓，〈從「韃靼」到「大清」：十七、八世紀日本幕府對清朝認識的建構〉，頁 122-124。

70 不著撰人，《清朝探事》，頁 120。

71 據劉序楓〈從「韃靼」到「大清」：十七、八世紀日本幕府對清朝認識的建構〉一文中之推測，《清朝探事》的成書時間應為 1719-1722 年期間。有關《華客答問錄》的分析討論參見蔡雅芸，〈康熙末年傳入日本的中國信息——以《華客答問錄》為中心〉，收入唐仕春主編，

內容：

問 聞說清朝也崇敬儒孝，但是明朝以來的孝問，文章詩詞才孝多，真儒少。如今傳受周程張朱之統，不惑異端的人是那一個。

答 目今清朝真儒也有，文章詩詞才孝通的也多，一時間說不盡。但是真儒裡頭，數一數二的是韓莢。⁷²

由上可知，十八世紀前期即便隨著清朝統治逐漸穩定，對清朝之稱也逐漸轉變，但對當時視程朱理學為正統的日本，對於「華夷變態」清朝的儒學似仍尚待保留，加上時幕府儒臣新井白石亦曾提及「前往長崎之唐人多無才學」，⁷³ 反之儒學、漢文文化始終持續的朝鮮、琉球，則成了日人求取序文詩畫的對象。如自十六世紀起先後擔任土佐掾、越後掾、和泉掾，且為皇室、幕府御用墨所的松井家古梅園，於十八世紀出版的《古梅園墨譜》中，即收有 1711 年朝鮮製述官李東郭為松井家著名的豐山墨所寫的贊文與所題的「豐山寶墨」四字，及 1714 年出使江戶的琉球掌翰使——程順則的序文。⁷⁴ 1748 年第八代幕府將軍吉宗甚至令同年前往江戶的琉球使節蔡宏謨為《庶物類纂》作序，⁷⁵ 唯蔡宏謨因於江戶期間疲於著作詩文與因應問答，每天過了半夜始可就寢，因此於返回薩摩藩途中才完成序文，並呈交與薩摩藩。⁷⁶

綜上可知，具有漢詩文學養的清朝朝貢國——朝鮮、琉球，成為「華」的分

《近代中國社會與文化流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 362-378。

72 不著撰人，《華客答問錄》（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葉 8。

73 新井白石著，今泉定介、市島謙吉編輯校訂，《新井白石全集》（東京：吉川半七，1906），第五卷，頁 309-310。另參見劉序楓，〈從「韃靼」到「大清」：十七、八世紀日本幕府對清朝認識的建構〉，頁 111。

74 有關古梅園松井家與朝、琉、清的交流活動參見松尾良樹，〈古梅園の造墨と文化交流〉，《近世文芸》，84 號（2006.7），頁 41-54；林麗江，〈日本古梅園相關墨書之研究——十八世紀中日藝術文化交流之一端〉，《漢學研究》，第 28 卷第 2 期（2010.6），頁 127-168。

75 《庶物類纂》為加賀藩本草學家稻生若水與其弟子丹羽正伯編纂，有關動植礦物的博物書，於 1738 年由加賀藩獻呈幕府，1745 年德川吉宗令丹羽正伯增補，總計千餘卷之大著。《庶物類纂》中除了琉球使節蔡宏謨所做的序文以外，另收有李東郭、1748 年朝鮮通信使節製述官朴敬行、醫官趙德祚之序。有關《庶物類纂》之相關研究參見太田由佳，〈稻若水と『庶物類纂』の編集〉，《洋學》，22 號（2014），頁 113-135；田籠博，〈丹羽正伯の『庶物類纂』編集と「産物帳」〉，《島大言語文化：島根大学法文学部紀要（言語文化学科編）》，35 號（2013.10），頁 1-11。

76 那霸市史編輯室編，《那霸市史：資料篇第一卷六》家譜資料二（下）（沖繩：那霸市企畫部市史編輯室，1980），頁 944。

身，獲得幕府認可，成為爭相交流的對象。其中如前述自 1680 年代與清朝締結宗藩關係的琉球，除了派遣朝貢使節外，也有接貢使節前往福州，另也派遣官生、勤學前往北京國子監、福州留學，建立起清琉間頻繁穩定的往來途徑，進而成爲江戶時代的日本接觸中華的重要接點，如前述 1714 年幕府儒臣新井白石即曾透過琉球使節向翰林院編修鄭任鑰求得序文，1719 年島津吉貴也曾將經由琉球傳入的《六論衍義》進獻給八代將軍吉宗，⁷⁷ 島津吉貴亦曾透過琉球向清人求取喜鶴亭之景觀詩。由此可見，十八世紀的日本不僅與朝鮮、琉球交流往來，亦開始出現與清人交流的意圖。

十八世紀中期以來，此一趨向更爲明顯，因成立於享保、元文間（1716-1740），由八代將軍吉宗下令彙整明清法制，比較兩者差異的報告書《名家叢書》中，關於明清禮制的差異有以下的描述：

一、孔廟ノ從祀ニ清朝ニハ朱子ヲ十哲ノ列ヘアゲタリ。

一、孔子ノ諡ヲ元朝ニ大成至聖文宣王ト号ス。明朝ニ始ハ元朝ノ如ナリ、其後古禮ヲ考テ、至聖先師孔子ト号ス。文宣王ト云諡ハモト唐朝ヨリ起リ、孔子ヲ諸侯王ノ位ニナスハ尊フ似テ却テ慮外ナリ。大成ト云ハ、孟子ニ集大成ト云ヘル文ニ本ヅキタレドモ、大成ハモト樂ノ上ノコトニテ、孟子ノ意モ比喻ナリ、是ヲ用テ孔子ヲ稱スルコト道理アタラザルユヘナリ。清朝ニハ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ト号ス、是ハ元朝ト明朝ト兩代ノ法ヲマジヘ用タルモノナリ。（中略）

一、康熙五十四年五經ノ題ヲ出スコトヲ停止シ、四書性理大全ヲ以テ題ヲ出ス。⁷⁸

即由清朝孔廟將朱子列爲十哲之列；孔子諡號採元明兩代折衷之稱，稱以「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以及康熙五十四（1715）年科舉改以《性理大全》出題等

77 「中華之儀ニ付申上候覺」見於大庭脩編，《享保時代の日中關係資料一——近世日中交渉史料集二》（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1986），頁 3。相關研究參見眞榮平房昭，〈琉球使節による中国見聞レポート—内閣文庫所蔵「中華之儀ニ付申上候覺」をめぐって—〉，收入琉中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編集，《第四回琉中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那霸：琉中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1993），頁 530-534。另 1666 年島津光久亦曾向奉幕府之命編纂《本朝通鑑》的林鷲峰表示，可經由琉球取得所需漢籍（林鷲峰，《國史館日錄》〔東京：日本國會圖書館藏〕，第四卷，頁 33-34），感謝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吳政緯先生提供此則史料。

78 荻生北溪，《名家叢書·明朝清朝異同·禮部》（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葉 2-3。

描述，可知日本具體認識到清朝尊崇儒學。進而使得江戶時代中後期以來的儒者那波魯堂（1727-1789）、大田錦城（1765-1825）等人表示「清朝ノ學、博ク經史ヲ讀ミ……程朱ノ眞ヲ得ルヲ旨トシ、徃徃ニ元明諸儒ノ說ニ勝レル處アリ」⁷⁹、「清祖宗雖出夷狄，其功德與漢祖唐宗無異，而其重道尊德則有過焉」。⁸⁰綜上可知，十八世紀中期以來日本對於清朝的儒學文教已予以肯定。⁸¹

加上十七世紀中後期至十八世紀初期間，人口、耕地大幅增加，帶動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導致幕府財政出現破綻，五代將軍綱吉經濟政策失敗，造成了社會經濟、體制各方面的混亂，至八代將軍吉宗積極推行經濟、文教、法典及行政等各項的改革政策（史稱享保改革），其中爲了減少人參、砂糖等輸入，造成銅、金等貴金屬外流，吉宗獎勵實學，放寬禁書政策，允許西洋書籍進口，帶動蘭學的發展。⁸²在此背景下，加上德川吉宗亦大量輸入中國書籍，甚至1719年起透過前往長崎貿易的清朝商人延攬醫師、馬醫、退役武官、歲貢生等陸續前往日本。⁸³即在德川吉宗對異國文化、知識的開放態度及政策下，清日交流活動顯得更爲寬鬆、自由。如前述奈良製墨店鋪古梅園的松井元規、元泰父子，於1730年代與前往長崎的清朝商人直接交流，亦藉由通信的方式，向清朝墨匠詢問製墨之法，同時也將自製的墨透過清商寄交徽州知名的墨匠，其後也與之書信往來，亦可見徽州的墨匠利用松井元泰寄贈的日本煙料製墨後，再託人交給松井元泰。⁸⁴《古梅園墨譜》中除收有出身琉球久米村的楊大壯、⁸⁵陳以棟的序跋外，⁸⁶也可見

79 那波魯堂，《學問源流》（福岡：九州大學中央圖書館雅俗文庫藏），葉46下。

80 大田錦城，《錦城文錄》（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葉25下。

81 詳細討論參見眞壁仁，〈德川儒學思想における明清交替：江戸儒學界における正統の転位とその変遷〉，《北大法学論集》，62卷6號（2012.3），頁43-102。

82 享保改革的背景及其影響參見大石學，《近世日本の統治と改革》（東京：吉川弘文館，2013）。

83 相關代表研究參見大庭脩，〈享保時代の来航唐人の研究〉，收入氏著，《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同朋舎，1984），頁437-488。

84 松尾良樹，〈古梅園の造墨と文化交流〉，頁41-54；林麗江，〈日本古梅園相關墨書之研究——十八世紀中日藝術文化交流之一端〉，頁127-168。

85 楊大壯於序文中提到「（前略）壬戌歲（1742），泉源氏遠寄圖式于余，親觀其圖，心愈企慕。但滄海渺茫，各隔一天，爰乘夢魂之興，聊爲之序云」。即楊大壯於1742年自泉源氏獲《古梅園墨譜》後爲之作序。泉源氏不知爲何人，但如從楊大壯1740年曾出使薩摩藩通報遣清使節回國，則極可能是經由薩摩藩促成楊大壯與古梅園松井氏間的交流活動。參見楊大壯，〈松井氏墨譜序〉，收入松井元泰注，《古梅園墨譜》元集（東京：宮内廳書陵部藏），葉序二b-序三a；橫山重等編，《中山世譜·附卷》（東京：東京美術，1972），卷3，頁51。林麗江，〈日本古梅園相關墨書之研究——十八世紀中日藝術文化交流之一端〉，頁148-149亦提及該次交流。

86 陳以棟於1740年曾任在船通事出使清朝。相關記載見沖繩縣立圖書館編，《歷代寶案·校訂

多名來舶清人所作的序文，另 1725 年荻生北溪校訂完成的《唐律疏議》中甚至收有刑部尚書勵廷儀之序。⁸⁷

此一相對較為寬鬆、自由的清日交流風氣此後仍持續著，如對中國書畫富感興趣的長島藩主增山雪齋，於 1788、1790 年先後派遣家臣春木南湖（1759-1839）、十時梅厓（1749-1804）前往長崎與清人進行詩文書畫交流。⁸⁸ 又據許宗彥「學士梁公家傳」記載：

公諱同書，字元穎，錢唐人……公少作書法顏柳，中年用米法，七十後愈臻變化純任自然，名滿天下，求書者紙日數束。……託公名者甚衆，其去真蹟遠矣。日本國有王子好書，以其書介舶商求公評定。⁸⁹

即梁同書自七十歲以後書名滿天下，求書者衆，甚至有「日本國王子」透過商人求梁同書評定自身書作。雖無法確知「日本國王子」究爲何人，但由此仍可知清日之間存在透過「舶商」即清朝商人的文化交流途徑，此一途徑亦持續至 19 世紀，因 1813 年船主譚竹庵曾爲市河寬齋求得梁同書的書法作品。⁹⁰ 此外，如前所述 1757 年曾發生清商偽作之事件，此皆反映出十八世紀中期以來，日本透過來崎清人展開文化交流的普遍現象。⁹¹

本》第 4 冊（那霸：沖繩縣教育委員會，1993），第 2 集第 24 卷，頁 372-373、375-376。

87（清）勵廷儀，《故唐律疏義序文》（東京：宮內廳書陵部藏）。相關分析參見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文化受容の研究》，頁 257-263。然值得注意的是，勵廷儀於序文中的落款記爲「雍正乙卯仲夏經筵講官起居注刑部尚書勵廷儀撰」，即該篇序文寫於雍正十三（1735）年，然據《國史大臣列傳正編》卷 95 可知，勵廷儀於雍正九（1731）年調職吏部尚書後仍專管刑部事務，隔年五月因病乞休，同年閏五月卒，據此勵廷儀《故唐律疏義序文》應爲偽作。即便如此，此仍舊呈現出當時的日本逐漸認同清朝文化，欲與清交流的積極氛圍。參見《國史大臣列傳正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統一編號：故傳 005677），卷 95。

88 有關增山雪齋對中國書畫的學習與受容之相關研究參見山口泰弘，〈江戸時代後期における中華文化受容の様相：画人増山雪斎二題〉，《三重大學教育學部研究紀要》，64 卷（2013.3），頁 75-86。

89（清）許宗彥，《鑒止水齋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48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德清許氏家刻本影印，卷 17，頁 171-173。

90 市河三喜，〈長崎と米庵及び寛齋〉，《商業と經濟》，第 18 卷第 1 號（1937.10），頁 24。譚竹庵的船頭記錄見中村質、劉序楓，〈日本來航唐船一覽——明和元～文久元（1764～1861）年〉，頁 98。

91 由收入於〈來舶清人研究ノート：附「來舶清人參考文獻」「來舶清人一覽表」〉一文中的「來舶清人一覽表」亦可見自 18 世紀中期以來清日間的交流顯著增加。參見唐權、劉建輝、王紫沁，〈來舶清人研究ノート：附「來舶清人參考文獻」「來舶清人一覽表」〉，《日本研究》，62 集（2021.3），頁 149-172。

在上述的風潮下，於 1754 年隨父親——第七代薩摩藩主島津重年（1729-1755，在職 1749-1755）前往江戶，1761 年始返回薩摩藩繼任藩主的島津重豪，亦積極地掌握漢文、清朝制度等，如 1767 年著手編纂漢語辭典《南山俗語考》，⁹² 1767-1768 年期間島津重豪亦曾與前往薩藩教授中華樂舞的琉球久米村人以漢語交談。⁹³ 雖島津重豪以對荷蘭知識、事物具高度興趣的「蘭癖大名」聞名，然由上可見，其對漢文、清朝制度等亦極為關注。此或係緣於個人興趣，唯如由島津重豪積極推展的藩政改革項目來看，則或具有實務之考量。⁹⁴

如 1771 年島津重豪再次自江戶返回薩摩藩後，曾表示薩摩武士仍存有戰國時代以來以武力為重，粗野鄙俗的風氣，⁹⁵ 因而於隔年下令以京坂風俗為目標，矯正薩摩武士的語言風俗，⁹⁶ 並於 1773 年建設聖堂（1786 年改名為造士館），選拔年滿八歲以上，有志於學問者，學習四書五經、小學、近思錄等。⁹⁷ 值得注意的是，建設聖堂的同一年，島津重豪曾要求以中城王子尙哲隨行樂師之身分一同前往薩藩的久米村人毛景裕、鄭得功，提供久米村孔廟儀式之資料，重豪訪問家臣伊勢兵部宅邸時，也邀毛、鄭兩人，並以漢語詢問聖廟之事，⁹⁸ 另要求琉球國王尙穆協助營造聖廟入德門、座之間，其後入德門上亦掛有尙穆題字之「入德門」之扁額。⁹⁹

92 《南山俗語考》後於 1812 年刊行，南山為重豪之號，其中第六卷《長短雜話》之會話文為島津重豪自著。

93 那霸市史編輯室編，《那霸市史：資料篇第一卷六》，家譜資料二（上）（沖繩：那霸市企畫部市史編輯室，1980），頁 180。

94 費德里柯·馬孔（Federico Marcon）著，林潔盈譯，《博物日本：本草學與江戶日本的自然觀》（新北：衛城出版，2022）一書中也由經濟層面說明島津重豪關注本草學所帶來的影響。

95 薩摩武士粗野鄙俗的樣貌亦可見於曾前往薩摩遊歷的龜井南冥《南遊記行》、橘南谿《西遊記》、古河古松軒《西遊雜記》等遊記中，詳細內容參見芳即正，《島津重豪》，頁 59-73。

96 鹿兒島縣維新史料編纂所編，《舊記雜錄追錄（六）》（鹿兒島：鹿兒島縣，1976），卷 127，第 852 號，頁 311-312；芳即正，《島津重豪》，頁 62-63。

97 相關研究參見芳即正，《島津重豪》，頁 59-94；高津孝，《博物學と書物の東アジア：薩摩・琉球と海域交流》，頁 13-16。

98 那霸市史編輯室編，《那霸市史：資料篇第一卷六》家譜資料二（下），頁 638、932。1796 年亦可見島津重豪向出使薩藩的琉球使者詢問聖廟禮法、清朝的政治風俗與學問等事。參見赤崎貞幹，《琉客談記》（夏威夷：寶玲文庫藏）；眞榮平房昭，〈清國を訪れた琉球使節の見聞録—『琉客談記』を中心に—〉，收入琉中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編集，《第八回琉球・中国交渉史に関するシンポジウム論文集》（那霸：沖繩縣教育委員會，2007），頁 123-142。

99 芳即正，《島津重豪》，頁 88-90。於島津重豪之前，吉貴的時代也進行了各項職制、禮俗制度的改革，相關研究將吉貴的改革定位為重豪改革的序曲。參見原口虎雄，〈鹿兒島藩概説〉，《藩法集 8：鹿兒島藩》（東京：創文社，1969），頁 15-16；林匡，〈島津吉貴的時代〉，頁 12-15。

即島津重豪爲了改變薩藩風俗，建造聖堂之際，借助掌握清朝文教制度風俗且具儒風的琉球，協助營建聖堂，強化文教的推行。

除了改變藩內風氣外，提升官位與國內地位於島津重豪時期仍是薩摩藩的重要課題。因該時期薩摩藩史無前例地以外樣大名的身分，成爲將軍家外戚。其經緯爲 1775 年重豪之女茂姬與一橋家德川治濟之嫡男豐千代訂下婚約，1779 年將軍世子家基突然病逝，時將軍家治無子嗣，因而於 1781 年以豐千代爲養子，並改名爲家齊，1786 年家治病逝，隔年家齊襲位成爲第十一代幕府將軍，島津重豪將成爲幕府將軍的岳父，爲了避嫌，重豪於 1787 年宣布退隱。此外，由於無外樣大名之女嫁爲將軍妻的前例，島津重豪即向系出平安時代的藤原北家，且爲後陽成天皇子嗣，並位居從一位公卿的近衛家提出收茂姬爲養女之請求，以因應將軍家迎娶世襲親王家，或出身攝政、關白公家女性之慣例。¹⁰⁰ 近衛家考量 1741 年六代將軍家宣之御台所天英院（近衛基熙之女）過世後，與將軍家之間的姻親關係中斷，因而接受重豪的請求，茂姬改名寔子，1789 年家齊與寔子完成結婚儀式。¹⁰¹

另一方面，由於繼任的薩摩藩主齊宣（1774-1841，藩主在職 1787-1809）年紀尚輕，因此退隱後的島津重豪即由江戶返回薩摩藩監管藩政。值得注意的是，島津重豪退隱的原因除前述爲了避嫌以外，另亦企圖使齊宣盡快晉升官位。¹⁰² 此外，重豪亦積極地與各大名建立親緣關係，如其子分別成爲越前丸岡藩主有馬氏、福岡藩主黑田氏等之養子，其女則分別嫁入美濃大垣藩、伊勢桑名藩、三河舉母藩等，此一親緣關係除了強化薩摩藩於國內的網絡外，甚至也成了十九世紀薩摩藩積極擴張唐物販售權，改善藩內財政不可忽視的助力。¹⁰³

100 除第一、二代幕府將軍的婚姻成立於江戶幕府創制之前，其正室分別爲武家的今川氏、淺井氏外，自江戶幕府成立後，至十代將軍爲止，將軍正室原則上皆出身世襲親王家，或出身攝政、關白公家。相關考察參見山本博文，《德川將軍家の結婚》（東京：文藝春秋，2005），頁 11-13。

101 參見林匡，〈島津氏の縁組—重豪・齊宣・齊興を中心に—〉，《黎明館調查研究報告》，第 26 集（2014.3），頁 49-51；松尾千歲，〈広大院——島津家の婚姻政策〉，收入鈴木彰、林匡編著，《島津重豪と薩摩の学問・文化——近世後期博物大名の視野と実践》（東京：勉誠出版，2015），頁 63-66。

102 鹿兒島縣維新史料編纂所編，《舊記雜錄追録（六）》，卷 140，第 2550 號，頁 931。另參見芳即正，《島津重豪》，頁 168。

103 芳即正，《島津重豪》，頁 203-206；林匡，〈島津氏の縁組—重豪・齊宣・齊興を中心に—〉，頁 53。

1792 年島津重豪辭去監管藩政之職，移居江戶高輪邸，此後積極展開編纂出版事業，如 1793 年令曾榮、白尾國柱改編《成形實錄》，¹⁰⁴ 1795 年令白尾國柱編纂《覽藩名勝考》，1797 年令山本正誼改編《島津世家》，後於 1802 年完成並改名為《島津國史》等。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各類書物的編纂出版，時值藩財政困難之際，¹⁰⁵ 因此應並非僅是基於島津重豪退隱後的個人興趣，如 1802 年《島津國史》完成後，同年重豪即要求水戶家將島津家始祖忠久的源賴朝落胤說補入《大日本史》，其目的據推測為德川氏自稱清和源氏新田氏支流，應是欲藉此強化與德川家間的連結。¹⁰⁶

綜上可見，自島津吉貴以來薩摩藩積極地強化並提升薩摩藩於國內的地位及其影響力，加上自十八世紀中期以來，認可清朝文教，及德川吉宗時期以來對外知識之取得與交流較為寬鬆的氛圍下，與來舶清人的往來活動逐漸增多，向清人取得讚頌自身作品的詩文書畫，亦代表著具儒教文化的清人對自身的肯定，此一轉變使得即便已能透過琉球途徑取得中國的知識、信息，且得以與清朝官員交流的薩摩藩，亦積極利用長崎途徑取得清人的詩文畫作及序跋等。除透過林梅卿向清人求取喜鶴亭十六景之序及詩外，1803 年島津重豪亦透過受延攬前往日本的清醫胡兆新，¹⁰⁷ 向清人求取其位於江戶高輪藩邸庭園之詩畫，¹⁰⁸ 並將 1788 年的〈喜鶴

104 1804 年成書刊行，改名為《成形圖說》，有關《成形圖說》的編纂、版本的分析考察參見高津孝，《江戸の博物学：島津重豪と南西諸島の本草学》（東京：平凡社，2017），頁 26-29；丹羽謙治，〈島津重豪の出版——『成形図説』版本再考〉，收入鈴木彰、林匡編著，《島津重豪と薩摩の学問・文化》，頁 35-51。

105 因江戸時代初期浮報石高、武士高達約 25% 的人口組成，以及參勤交替、普請等因素下造成薩摩藩慢性財政困窘，1753 年負債約金 66 萬兩，至 1801 年增至約 120 萬兩，此後甚至擴充至 500 萬兩。為此，島津重豪在職期間即持續進行簡約政策，以及獎勵農耕與奄美大島、德之島、喜界島砂糖專賣等開源節流的財政改革。有關薩摩藩與島津重豪的財政改革參見黑田安雄，〈安永・天明期における薩摩藩の動向〉，《地方史研究》，第 22 卷第 6 號（1972.12），頁 25-38；芳即正，《島津重豪》，頁 179-181；芳即正，《調所広郷》（東京：吉川弘文館，1987），頁 34-48；大矢野榮次，〈薩摩藩の財政改革と調所広郷：島津重豪に重用され，島津齊彬に消された男〉，《経済社会研究》，第 58 卷第 1、2 合併號（2018.6），頁 1-19 等文。

106 芳即正，《島津重豪》，頁 119。

107 胡兆新於 1803 年 12 月乘清商船抵日，1805 年 4 月返航，其赴日經緯及在日期間的交流活動之相關研究參見郭秀梅，〈清医胡兆新の来日記録と業績——長崎における一八〇三～一八〇五年の活動（一）〉，《日本医史学雑誌》，47 卷 1 號（2001.3），頁 83-103；同氏著，〈清医胡兆新の来日記録と業績——長崎における一八〇三～一八〇五年の活動（二）〉，《日本医史学雑誌》，47 卷 2 號（2001.6），頁 261-281。

108 畫冊內容為由出身江蘇省常熟縣的畫家沈桂為庭園中的十五景作畫，各景搭配汪浩春、俞祥沅、滕震、王巖、丁右文、施心誠、顥不子等清人的十五首詩作。該畫冊現藏於野崎家鹽業歷史館，相關研究參見塚本磨充，〈日本の風景を画いた清朝画家：沈桂「亀鶴塲詩画冊」と

亭十六景序·詩〉收入於《覽藩名勝考》，且刻意加入序文、詩作作者的官銜，甚至配合山本正誼〈十六景記〉修改調整〈十六景詩〉的題名、內容及順序，此舉應具有藉由出版物的流通，展現清朝中央文官讚賞大名權力象徵之一的庭園，¹⁰⁹從而達到提升國內威望之效。¹¹⁰

四、結語

本文透過考察十七世紀壟斷琉球途徑的薩摩藩島津氏，自十八世紀起亦透過長崎途徑向清人求取書畫之例，指出其原因除十七世紀後期江戶幕府的統治政策轉變，加上十八世紀以來隨著藉由前往長崎的清朝商人傳遞清朝統治穩定之信息，幕府亦透過主動問答，掌握清朝的風俗制度，日本逐漸地認識到「華夷變態」的清朝是一尊崇儒教的王朝，以及德川吉宗爲了改善大量輸入人參、砂糖等商品，導致貴金屬嚴重外流等問題，放寬禁書政策，並延攬技術清人來日，與清人的往來較爲寬鬆，薩摩藩則爲了爭取官位晉升、改善藩內士風，於島津吉貴時期利用位屬清朝朝貢國第二的琉球，具增添將軍武威之效，順利地提升官位。島津重豪時期，因與幕府將軍的姻親關係，除了仍舊透過琉球取得所需的中國知識、信息外，也利用長崎途徑向清人求取詩文書畫等，並藉由出版物的流通，展現獲清朝中央文官認可的威權象徵，以作爲強化、提升薩摩藩於日本國內的地位及其影響力之一環。

本文雖結合薩摩藩內部因素考察清日文化交流的意義，然其背後仍涉及十八世紀以來江戶幕府、儒者等各層面對於清朝的認識、「華夷觀」的轉變，此部分將留作日後課題持續關注，於另文深入探討。

島津重豪〉，頁 1-32。

109 白幡洋三郎，《大名庭園——江戸の饗宴》（東京：講談社，1997），頁 20-46。

110 此外，收入島津久徵於 1787-1807 年期間詩作的《名山樓集·二編》中可見「甲子秋舶來清客王胡劉張等因价贈詩稱□鶴山，鶴山蓋余少時別號矣，有感而作」之記載，即島津久徵因甲子（1804）年秋前來長崎的清人特意致詩，爲此特作一詩。由 1804 年入長崎港的三番、五番及九番之南京船主分別爲王蘭谷、張秋琴，隔年初四番南京船主爲劉景筠，推測詩中所提王、劉、張，應爲王蘭谷、張秋琴及劉景筠。胡則應爲 1803-1804 年滯日的胡兆新。以上記載見於島津久徵，《名山樓詩集·二編》卷之 5（鹿兒島：鹿兒島大學附屬圖書館玉里文庫藏），葉 25a；中村質、劉序楓，〈日本來航唐船一覽——明和元～文久元（1764～1861）年〉，頁 80-82。另值得注意的是，由此詩作可知，薩摩藩與清人間的交流活動自 18 世紀中期以來仍舊持續進行，具體的交遊關係、交流網絡尚待持續蒐羅相關事例、史料始可進一步掌握。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明) 李時珍,《本草綱目》,臺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1976。
- (清) 于敏中輯,《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收入嚴靈峯編輯,《書目類編(三)》,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據清同治間黎永椿等校刊本影印。
- (清) 汪啓淑,《續印人傳》,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09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年海虞顧氏刻本。
- (清) 袁枚,《隨園詩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70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上海圖書館藏乾隆十四年刻本影印。
- (清) 許宗彥,《鑒止水齋集》,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8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嘉慶二十四年德清許氏家刻本影印。
- (清) 蘇樹蕃編,《清朝御史題名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76,據清光緒間刊本影印。
- (清) 慶桂等修,《清實錄·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清) 潘奕雋,《三松堂集》,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9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嘉慶道光遞刻本影印。
- (清) 蔣元益,《時庵自撰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98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 (清) 錢泳,《登樓雜記(一)》,收入劉玉才、陳紅彥主編,《國家圖書館未刊稿叢書》,南京:鳳凰出版社,2021。
- (清) 錢泳,《履園叢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13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十八年述德堂刻本影印。
- (清) 錢泳撰,鈴木朥學會編,《離屋集初編》,愛知:鈴木朥學會,2010。
- (清) 錢榮等,〈喜鶴亭十六景序·詩〉,鹿兒島:尚古集成館藏。
- (清) 勵廷儀,《故唐律疏義序文》,東京:宮內廳書陵部藏。
- 吳秀之等修、曹允源等纂,《吳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民國二十二年鉛印本。
- (江戶) 十時梅厓,《崎陽筆語》,大阪: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藏。
- (江戶) 大田錦城,《錦城文錄》,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 (江戶) 山本正誼,〈喜鶴亭十六景記〉,鹿兒島:尚古集成館藏。
- (江戶) 山本正誼,《秋水山本正誼遺稿》,鹿兒島:鹿兒島縣立圖書館藏。
- (江戶) 山本正誼,《秋水先生文集》,大阪:大阪大學附屬圖書館藏。
- (江戶) 不著撰人,《清朝探事》,收入大庭脩編,《享保時代の日中關係資料二——朱氏三兄弟集》,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1995。

- (江戸) 不著撰人，《華客答問錄》，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 (江戸) 本田親孚、平山武毅編，《薩藩名勝志》，收入鹿兒島縣史料刊行會編，《鹿兒島縣史料集（42）》，鹿兒島：鹿兒島縣史料刊行會，2003。
- (江戸) 白尾國柱，《鹿兒島名勝考》，奈良：大和文華館藏。
- (江戸) 白尾國柱，鹿兒島縣維新史料編纂所編，《覽藩名勝考》，鹿兒島：鹿兒島縣史料刊行會，1982。
- (江戸) 伊藤松，《鄰交徵書》，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
- (江戸) 赤崎貞幹，《琉客談記》，夏威夷：阪卷・寶玲文庫藏。
- (江戸) 松井元泰、松井元彙，《古梅園墨譜》、《古梅園墨譜後編》合刊本，東京：宮內廳書陵部藏。
- (江戸) 林鷺峰，《國史館日錄》，東京：日本國會圖書館藏。
- (江戸) 那波魯堂，《學問源流》，福岡：九州大學中央圖書館雅俗文庫藏。
- (江戸) 春木南湖，《西游日簿》，東京：日本國會圖書館藏。
- (江戸) 島津久徵，《名山樓詩集》，鹿兒島：鹿兒島大學附屬圖書館玉里文庫藏。
- (江戸) 島津久徵，《名山樓詩集・二編》，鹿兒島：鹿兒島大學附屬圖書館玉里文庫藏。
- (江戸) 荻生北溪，《名家叢書・明朝清朝異同・禮部》，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 (江戸) 曾槃，《仰望節錄：島津重豪》，收入堀田璋左右、川上多助共編，《日本偉人言行資料》，東京：國史研究會，1917。
- (江戸) 新井白石著，今泉定介、市島謙吉編輯校訂，《新井白石全集》，東京：吉川半七，1906。
- 大庭脩編著，《享保時代の日中關係資料——近世日中交渉史料集二》，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1986。
- 沖繩縣立圖書館編，《歷代寶案・校訂本》第4冊，那霸：沖繩縣教育委員會，1993。
- 那霸市史編輯室編，《那霸市史：資料篇第一卷六》，家譜資料二（上、下），沖繩：那霸市企畫部市史編輯室，1980。
- 高柳真三、石井良助編，《御觸書寛保集成》，東京：岩波書店，1934。
- 鹿兒島縣維新史料編纂所編，《舊記雜錄追錄（二）》，鹿兒島：鹿兒島縣，1973。
- 鹿兒島縣維新史料編纂所編，《舊記雜錄追錄（三）》，鹿兒島：鹿兒島縣，1973。
- 鹿兒島縣維新史料編纂所編，《舊記雜錄追錄（五）》，鹿兒島：鹿兒島縣，1975。
- 鹿兒島縣維新史料編纂所編，《舊記雜錄追錄（六）》，鹿兒島：鹿兒島縣，1976。
- 鹿兒島縣維新史料編纂所編，《舊記雜錄後編（五）》，鹿兒島：鹿兒島縣，1985。
- 横山重等編，《中山世譜》，東京：東京美術，1972。

橫山重等編，《中山世譜・附卷》，東京：東京美術，1972。

《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庫》，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清代檔案檢索系統》，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立公文書館數位資料庫》，東京：國立公文書館。

《国書データベース》，<https://kokusho.nijl.ac.jp/biblio/100364829/1?ln=ja>，檢索日期：2023年4月。

近代論著

王振忠，〈清代藏書家汪啓淑的商業經營與社會生活——對幾份新見契約文書的解讀〉，《學術月刊》，第51卷，2019年1月，頁164-184。

仇京家，〈蔣杲藏書、校書事略考述〉，《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5年12月，頁49-53。

沈玉慧，〈18世紀經由琉球途徑的清日文化交流〉，《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33卷第1期，2021年3月，頁89-100。

林麗江，〈日本古梅園相關墨書之研究——十八世紀中日藝術文化交流之一端〉，《漢學研究》，第28卷第2期，2010年6月，頁127-168。

徐興慶，〈近世中日文化交流探微——以「存誠長崎筆談」為中心〉，《華岡外語學報》，復刊號，1994年5月，頁21-39。

陳曦鐘，〈再談高彝與《七子詩選》——《關於「大學頭」及其他》補說〉，《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3卷第1期，2006年1月，頁82-88。

陳曦鐘，〈關於「大學頭」及其他——《七子詩選》流傳日本考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1卷第6期，2004年11月，頁94-101。

費德里柯·馬孔（Federico Marcon），林潔盈譯，《博物日本：本草學與江戶日本的自然觀》，新北：衛城出版，2022。

劉序楓，〈從「韃靼」到「大清」：十七、八世紀日本幕府對清朝認識的建構〉，收入劉序楓主編，《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臺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2018，頁97-142。

蔡雅芸，〈康熙末年傳入日本的中國信息——以《華客答問錄》為中心〉，收入唐仕春主編，《近代中國社會與文化流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362-378。

蔡毅，〈長崎清客與江戶漢詩——新發現的江芸閣、沈萍香書簡初探〉，《清華學報》，第34卷第1期，2004年6月，頁103-222。

「日本近世生活絵引」南九州編編纂共同研究班，《日本近世生活絵引：南九州編》，橫濱：神奈川大学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非文字資料研究センター，2018。

井上敏幸，〈日中交流の現場とその遺産——『存誠長崎筆談』の世界〉，收入伊藤昭弘

- 編，《佐賀学Ⅲ 佐賀をめぐる「交流」の展開》，佐賀：佐賀大学地域学歴史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17，頁 80-132。
- 井上良吉，《磯乃名所旧蹟》，鹿兒島：井上左恵，1931。
- 郭秀梅，〈清医胡兆新の来日記録と業績——長崎における一八〇三～一八〇五年の活動（一）〉，《日本醫史學雜誌》，47 卷 1 號，2001 年 3 月，頁 83-103。
- 郭秀梅，〈清医胡兆新の来日記録と業績——長崎における一八〇三～一八〇五年の活動（二）〉，《日本医史学雜誌》，47 卷 2 號，2001 年 6 月，頁 261-281。
- 宮城栄昌，《琉球使者の江戸上り》，東京：第一書房，1982。
- 宮田安，《唐通事家系論攷》，長崎：長崎文獻社，1979。
- 金井俊行，《長崎年表 第 2》，東京：以文會社，1888。
- 原口虎雄，〈鹿兒島藩概説〉，《藩法集 8：鹿兒島藩》，東京：創文社，1969。
- 五代秀堯、橋口兼柄編，《三國名勝圖會》，東京：山本盛秀，1905。
- 高津孝，〈長崎の清人と薩摩の漢詩集〉，收入氏著，《博物学と書物の東アジア：薩摩・琉球と海域交流》，沖縄：榕樹書林，2010，頁 248-261。
- 高津孝，《江戸の博物学：島津重豪と南西諸島の本草学》，東京：平凡社，2017。
- 山口泰弘，〈江戸時代後期における中華文化受容の様相：画人増山雪斎二題〉，《三重大學教育學部研究紀要》，64 卷，2013 年 3 月，頁 75-86。
- 山本博文，《島津義弘の賭け》，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1。
- 山本博文，《徳川將軍家の結婚》，東京：文藝春秋，2005。
- 市河三喜，〈長崎と米庵及び寛齋〉，《商業と經濟》，第 18 卷第 1 號，1937 年 10 月，頁 7-46。
- 紙屋敦之，《大君外交と東アジア》，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
- 重野安繹，《成齋文初集 三》，東京：富山房，1898。
- 松尾千歳，〈広大院——島津家の婚姻政策〉，收入鈴木彰、林匡編著，《島津重豪と薩摩の学問・文化——近世後期博物大名の視野と実践》，東京：勉誠出版，2015，頁 57-69。
- 松尾良樹，〈古梅園の造墨と文化交流〉，《近世文芸》，84 號，2006 年 7 月，頁 41-54。
- 上村文，〈薩摩藩長崎問役——設置の経緯とその役職について〉，《黎明館調査研究報告》，第 16 集，2003 年 3 月，頁 79-90。
- 森公章，《天神様の正体：菅原道眞の生涯》，東京：吉川弘文館，2020。
- 眞栄平房昭，〈清国を訪れた琉球使節の見聞録—『琉客談記』を中心に—〉，收入琉中歴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編集，《第八回琉球・中国交渉史に関するシンポジウム論文集》，那覇：沖縄縣教育委員會，2007，頁 123-142。

- 眞栄平房昭，〈琉球使節による中国見聞レポート—内閣文庫所蔵「中華之儀ニ付申上候覚」をめぐる—〉，收入琉中歴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編，《第四回琉中歴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那覇：琉中歴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1993，頁 517-537。
- 眞壁仁，〈徳川儒学思想における明清交替：江戸儒学界における正統の転位とその変遷〉，《北大法学論集》，62 卷 6 號，2012 年 3 月，頁 43-102。
- 太田由佳，〈稻若水と『庶物類纂』の編集〉，《洋学》，22 號，2014 年，頁 113-135。
- 大石学，《近世日本の統治と改革》，東京：吉川弘文館，2013。
- 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同朋舎，1984。
- 大矢野栄次，〈薩摩藩の財政改革と調所広郷：島津重豪に重用され，島津斉彬に消された男〉，《経済社会研究》，第 58 卷第 1、2 合併號，2018 年 6 月，頁 1-19。
- 丹羽謙治，〈島津重豪の出版——『成形図説』版本再考〉，收入鈴木彰、林匡編著，《島津重豪と薩摩の学問・文化——近世後期博物大名の視野と実践》，東京：勉誠出版，2015，頁 35-47。
- 丹羽謙治編，《令和元年度 鹿兒島大學附屬圖書館貴重公開中央図書館オープン 25 周年記念「平成」新収 未公開貴重書展》，鹿兒島：鹿兒島大學附屬圖書館，2019。
- 池畑耕一，〈薩藩の考古学者 白尾国柱〉，《黎明館調査研究報告》，第 2 集，1988 年 3 月，頁 1-23。
- 中村質、劉序楓，〈日本来航唐船一覧——明和元～文久元（1764～1861）年〉，《九州文化史研究所紀要》，第 41 號，1997 年 3 月，頁 1-155。
- 塚本麿充，〈日本の風景を画いた清朝画家：沈桂「亀鶴劫詩画冊」と島津重豪〉，《中国文史論叢》，15 號，2019 年 3 月，頁 1-32。
- 田村省山，《尚古集成館——島津氏 800 年の収蔵》，鹿兒島：春苑堂，1993。
- 田籠博，〈丹羽正伯の『庶物類纂』編集と「産物帳」〉，《島大言語文化：島根大學法文學部紀要（言語文化学科編）》，35 號，2013 年 10 月，頁 1-11。
- 唐權、劉建輝、王紫沁，〈来舶清人研究ノート：附「来舶清人参考文献」「来舶清人一覧表」〉，《日本研究》，62 集，2021 年 3 月，頁 131-172。
- 唐權，〈長崎歴史文化博物館蔵『書翰集』について〉，收入武内恵美子編，《近世日本と楽の諸相》，京都：京都市立藝術大學日本伝統音楽研究センター，2019，頁 201-220。
- 白幡洋三郎，《大名庭園——江戸の饗宴》，東京：講談社，1997。
- 富田千夏，〈琉球王国接貢制度の研究：清代における「接貢」に関わる人々の往還の一家譜資料を中心に—〉，沖縄：琉球大學大学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科比較地域文化専攻博士論文，2014。
- 芳即正，《調所広郷》，東京：吉川弘文館，1987。
- 芳即正，《島津重豪》，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

堀新，〈近世武家官位試論〉，《歷史學研究》，703 號，1997 年 10 月，頁 90-99。

本土博成，〈宝永正徳期の幕薩琉関係〉，《日本史研究》，第 703 號，2021 年 3 月，頁 89-124。

李啓煌，〈近世武家官位制の成立過程について〉，《史林》，74 卷 6 號，1991 年 11 月，頁 44-74。

林匡，〈島津吉貴の時代〉，《黎明館調查研究報告》，第 21 集，2008 年 3 月，頁 1-50。

林匡，〈島津氏の縁組—重豪・斉宣・斉興を中心に—〉，《黎明館調查研究報告》，第 26 集，2014 年 3 月，頁 33-71。

黒田安雄，〈安永・天明期における薩摩藩の動向〉，《地方史研究》，第 22 卷第 6 號，1972 年 12 月，頁 25-38。

圖版出處

- 圖 1 〈喜鶴亭十六景圖：園內八景圖〉，尙古集成館藏。圖版取自尙古集成館。
- 圖 2 《薩藩勝景百圖》第 2 景鹿兒島其二（右），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圖版取自「日本近世生活絵引」南九州編編纂共同研究班，《日本近世生活絵引：南九州編》，橫濱：神奈川大學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非文字資料研究センター，2018，頁 4。
- 圖 3 《薩藩勝景百圖》第 1 景鹿兒島，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圖版取自「日本近世生活絵引」南九州編編纂共同研究班，《日本近世生活絵引：南九州編》，橫濱：神奈川大學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非文字資料研究センター，2018，頁 4。
- 圖 4 〈元祿國繪圖薩摩國〉，局部。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
- 圖 5 〈喜鶴亭十六景圖：園外八景圖〉。尙古集成館藏。圖版取自尙古集成館。
- 圖 6-1~6-5 〈喜鶴亭十六景序・詩〉，尙古集成館藏。圖版取自尙古集成館。
- 圖 7 山本正誼，〈喜鶴亭十六景記〉，局部，尙古集成館藏。圖版取自尙古集成館。
- 圖 8 蔣元益，〈行書七言聯〉，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 圖 9 蔣元益，〈匹練州〉，尙古集成館藏。圖版取自尙古集成館。

附表一 「尙喜」、「覽喜」〈喜鶴亭十六景詩〉異同比較表

尙 喜	慶 喜
喜鶴亭十六景序 (中略)歲在著雍涒灘圉余月穀旦 左春坊錢榮 印：錢榮(朱) 三元(白)	喜鶴亭十六景序 (中略)歲在著雍涒灘圉余月穀旦 左春坊錢榮
1 突兀孤峰壓二州 孱顏宛在水中流 画欄相映烟霞色 人傳仙巖百尺樓 右題望嶽樓 嵇璜 印：嵇璜之章(白) 拙修(朱)	12 飛鳥道 大學士嵇璜 灰逕垂空界碧山 人依飛鳥試躋攀 紅塵不到芒屨底 徐度松雲幾疊關
2 名山遙對院門青 六月寒生古樹林 噓氣成雲迷洞府 蒼苔冥漢鎖層陰 右題龍洞院 王昶 印：王昶之印(白) 通議大夫(白)	11 龍洞院 承宣布政司王昶 天平遙封院門青 四月寒生古樹林 噓氣成雲迷洞府 蒼苔冥漢瑣層陰
3 巍然神宇白雲邊 靈爽憑依別有天 洗淨塵緣留好景 楓香蕉色寺門前 右題管神廟 李榮 印：李榮之印(白) 滄雲(朱)	9 管神廟 御史李榮 巍然神宇白雲邊 靈爽憑依別有天 洗淨塵緣留好景 楓香蕉色寺門前
4 張家紅粉擅風流 圖畫天然到練洲 好賺漁郎成問訊 一溪春滿海東頭 右題櫻花溪 王文治 印：王印文治(白) 曾經滄海(白)	10 櫻花溪 太守王文治 張家紅粉擅風流 圖畫天然到練洲 好賺漁郎成問訊 一溪春滿海東頭
5 羣峰環抱一泓秋 水落水高早暮流 正合僊園人佇足 果然身已到瀛洲 右題朝夕池 顧宗泰 印：顧印宗泰(白) 星橋(朱)	13 朝夕池 主事顧宗泰 羣峯環抱一泓秋 水落水高早暮流 正合僊園人佇立 果然身已到瀛洲
6 雲羅霧縠影相將 疊雪輕勻帶水鄉 倘倩白魚拋玉尺 量來應有幾多長 右題匹練洲 蔣元益 印：蔣印元益(白) 時庵(朱)	14 匹練洲 侍郎蔣元益 雲羅霧縠影相將 疊雪輕勻帶水鄉 倘倩白魚拋玉尺 量來應有幾多長

尚 喜	麀 喜
7 海門兀峙鎖洪濤 能抗前津風怒號 萬里乘潮客出入 玉鯨隱隱與金鯢 <u>右題枚聞山 彭紹觀</u> 印：彭印紹觀（白） 鏡瀾（朱）	16 <u>海門山 侍讀學士彭紹觀</u> 海門兀峙鎖洪濤 能抗前津風怒號 萬里乘潮客出入 玉鯨陰陰與金鯢
8 高峯儼與碧霄齊 矗立當空萬象低 絕頂徘徊天闕近 何須更上步雲梯 <u>右題養老山 梁同書</u> 印：梁同書印（白） 山舟（朱）	15 <u>天平山 翰林院編修梁同</u> 高峯儼與碧霄齊 矗立當空萬象低 絕頂徘徊天闕近 何須更上步雲梯
9 古木垂蘿擁竹關 寥寥孤月照仙寰 衣巾不帶風塵色 一片道心雲共閒 <u>右題弋志菴 嚴福</u> 印：嚴福之印（白） 愛亭（朱）	8 <u>葡萄架 翰林院編修加一級嚴福</u> 漢使西歸味共探 移栽嘉種遍東南 結陰成架初添竹 珠帳艸龍護碧嵐
10 華表雕牆臨海開 巍巍清廟望蔥哉 鳴鳩兩兩自如雪 雲際翱翔含瑞來 <u>右題八幡廟 范來宗</u> 印：范來宗印（白） 芝嚴（朱）	7 <u>萩蒿叢 翰林院編修范來宗</u> 歷亂秋風影不齊 含煙和露隔花溪 莫嫌寂寞蓬蒿逕 慣遣高人遠托栖
11 千葉由來塵外姿 田田擎露蔭芳池 花含霞彩碧波上 恰是嫦娥出海時 <u>右題千葉蓮 汪如洋</u> 印：汪印如洋（白） 潤民（朱）	6 <u>番蕉邱 翰林院修撰汪如洋</u> 培成翠碧帶山腰 葉葉迎風鳳尾搖 也抱歲寒心似鐵 不驚飛雲響肅肅
12 虬枝低亞翠成堆 未受秦封次第栽 薄葢擁濤風影動 疑撐月到薩摩來 <u>右題赤松林 吳俊</u> 印：吳俊私印（白） 蠡濤（朱）	2 <u>赤松林 雲南學政吳俊</u> 虬枝低亞翠成堆 未受秦封次第栽 薄葢擁濤風影動 疑撐月到薩摩來
13 <u>大師秘水濟慈航</u> 正識東西法所由 日夜清流散明玉 諸天長仰遍照光 <u>右題大沙川 曾謙光</u> 印：曹印謙光（白） 約心（朱）	1 <u>鳴雨泉 戊申仲夏 外史曹謙光</u> 山脉通源日夜流 淋淋似雨響園秋 烹來石鼎供茶話 七椀邀盧一咲休

尚 喜	麿 喜
14 春風吹醉早楓丹 夾岸香來到曲欄 此景獨餘海外有 神仙應羨是奇觀 <u>右題香楓巖 董誥</u> <u>印：董誥之印（白） 蔗林（朱）</u>	4 <u>香楓巖 經筵講官戶部尚書董誥</u> 春風吹醉早楓丹 夾岸香來到曲欄 此景獨餘海外有 神僊應羨是奇觀
15 <u>飛泉百丈白雲邊 還訝銀龍落九淵</u> <u>盧嶽風光猶似見 彩毫誰繼李青蓮</u> <u>右題觀水榭 金士松</u> <u>印：金印士松（白） 聽濤（朱）</u>	5 <u>脩竹徑 吏部右侍郎順天學政金士松</u> <u>琅玕千萬立成林 細路通人幽境深</u> <u>傍午不知過赤日 清涼慣透愛吟心</u>
16 雲根拔地幾何年 形肖蛟騰却宛然 千古青蒼冠名勝 每逢風雨似昇天 <u>右詠千尋巖 江琅</u> <u>印：江琅之印（白） 淑齋（朱）</u>	3 <u>騰蛟石 翰林庶常出知福寧刺史江琅</u> 雲根拔地幾何年 形肖蛟騰却宛然 千古青蒼冠名勝 每逢風雨似昇天

1. 相異處以底線標示；
2. 各詩作之數字為其先後順序；
3. 「麿喜」之內容除 1982 年出版的活字本《麿藩名勝考》外，另酌參大和文華館藏異名的抄寫本《鹿兒島名勝考》。

Exchange Between the Shimazu Clan of Satsuma Domain and Qing Scholars: Taking the Preface and Poetry of the “Sixteen Views of Kikakutei” as an Example^{*}

Shen, Yu-hui^{**}

Abstract

The Satsuma Domain kept Ryukyu under strict control since it sent troops to the islands in 1609. In the 1630s, when the Shogunate banned Catholicism and implemented an isolationist foreign policy, Ryukyu turned out to be one of the main routes for Japan to access Chinese knowledge and commodities. After Ryukyu dispatched a delegation to Edo in 1634 and later established a suzerain-vass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Qing dynasty, Ryukyu became an intermediar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Satsuma, despite monopolizing the Ryukyu route since the early-17th century, also resorted to the Nagasaki route to engage in exchange with several Qing scholars. This development might have been driven by the factors that Shogunate's governance gravitated towards the cultural policy since the late-17th century, that Japan's understanding of the Qing transformed since the 18th century, and that the Shogunate lifted some restrictions of accessing foreign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Certainly, the ramifications of Satsuma's domestic affairs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By looking into the case where Satsuma exchanged with Qing scholars via Nagasaki and examining the above-mentioned historical backdrop and Satsuma's domestic factors,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 causes,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historical event.

Keywords: Satsuma domain, Shimazu clan, Shimazu Shigehide, “Sixteen Views of Kikakutei,” Nagasaki,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

^{*} Received: 4 February 2023; Accepted: 12 April 2023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圖4 元祿繪圖薩摩國 局部



圖1 喜鶴亭十六景圖：園內八景 尚古集成館藏



圖2 薩藩勝景百圖 第2景鹿兒島其二（右）





圖3 薩藩勝景百圖 第1景鹿兒島



圖5 喜鶴亭十六景圖：園外八景 尚古集成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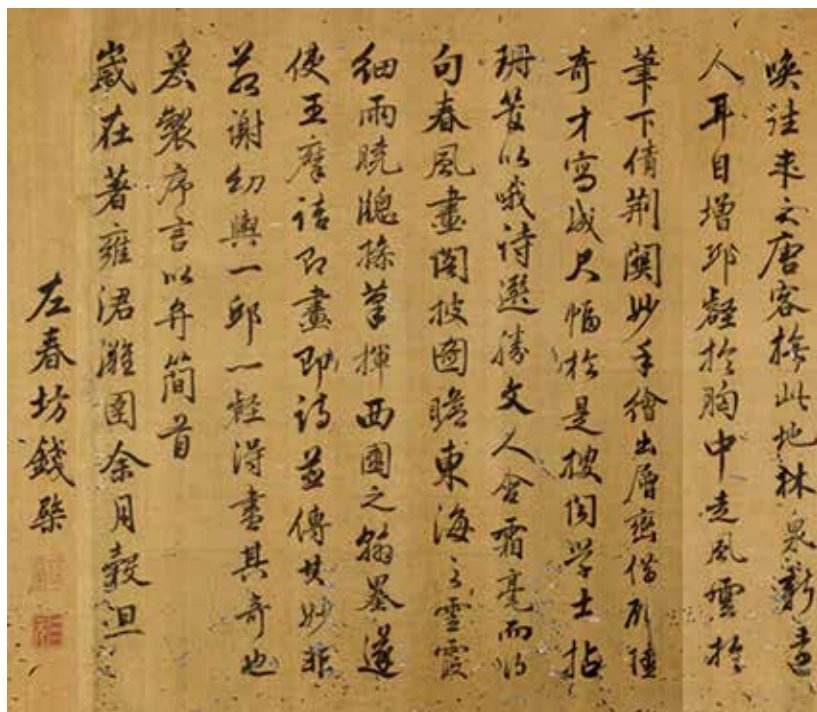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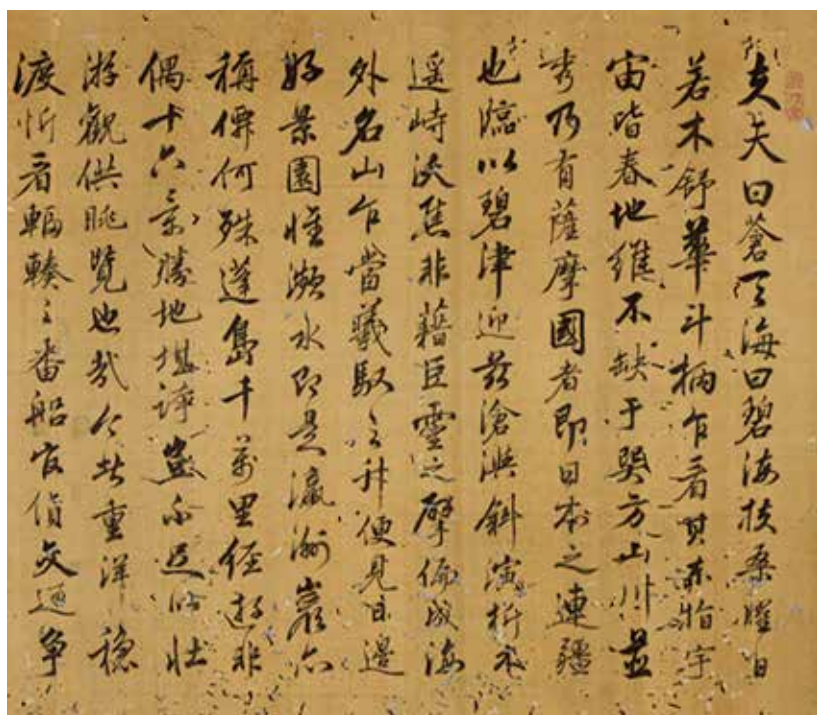


圖 6-1 喜鶴亭十六景序·詩 局部 尚古集成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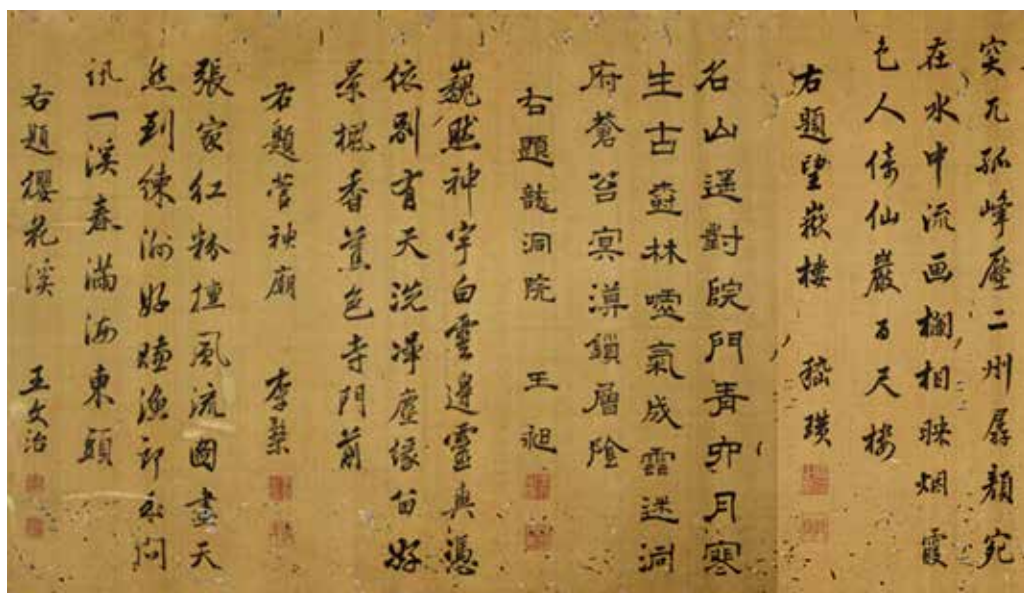


圖 6-2 喜鶴亭十六景序·詩 局部 尚古集成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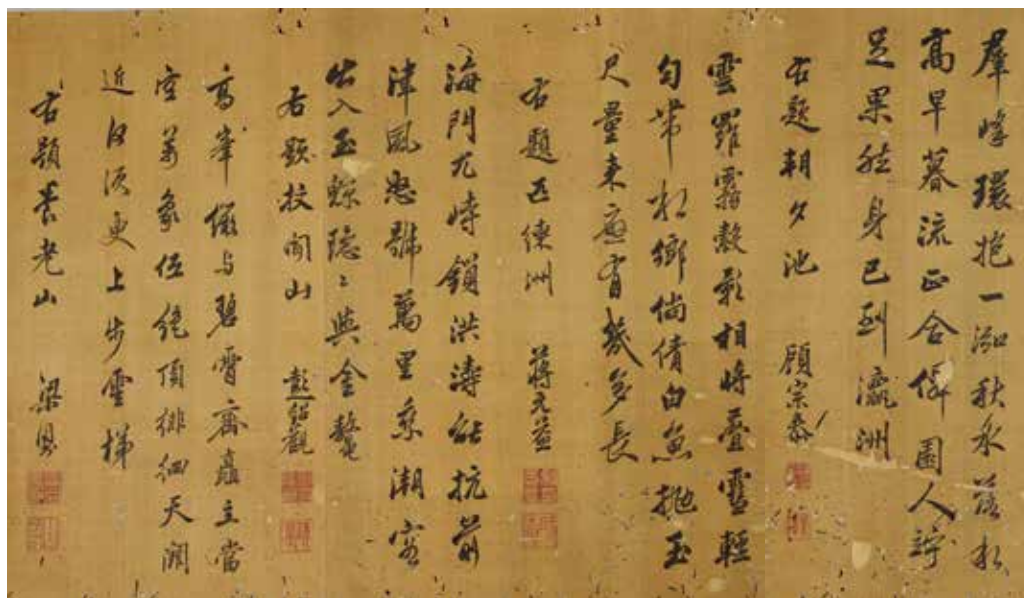


圖 6-3 喜鶴亭十六景序·詩 局部 尚古集成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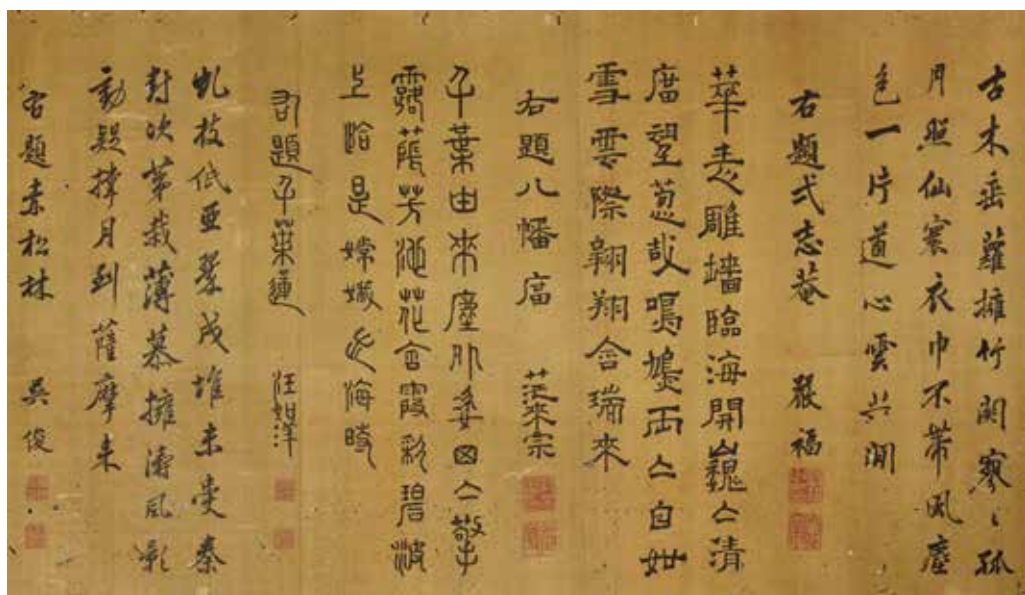


圖 6-4 喜鶴亭十六景序·詩 局部 尚古集成館藏



圖 6-5 喜鶴亭十六景序·詩 局部 尚古集成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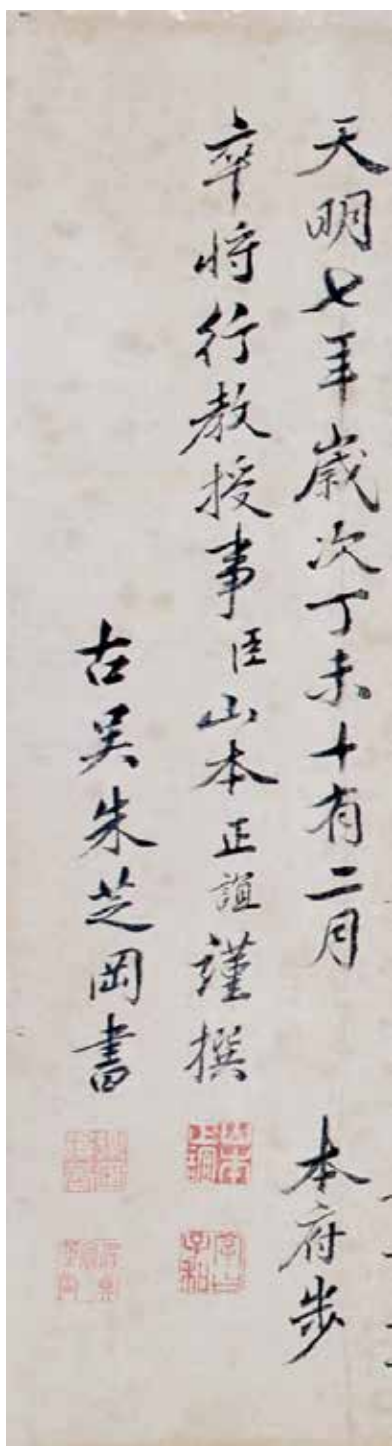


圖7 山本正誼 喜鶴亭十六景記
局部 尚古集成館藏



圖8 蔣元益 行書七言聯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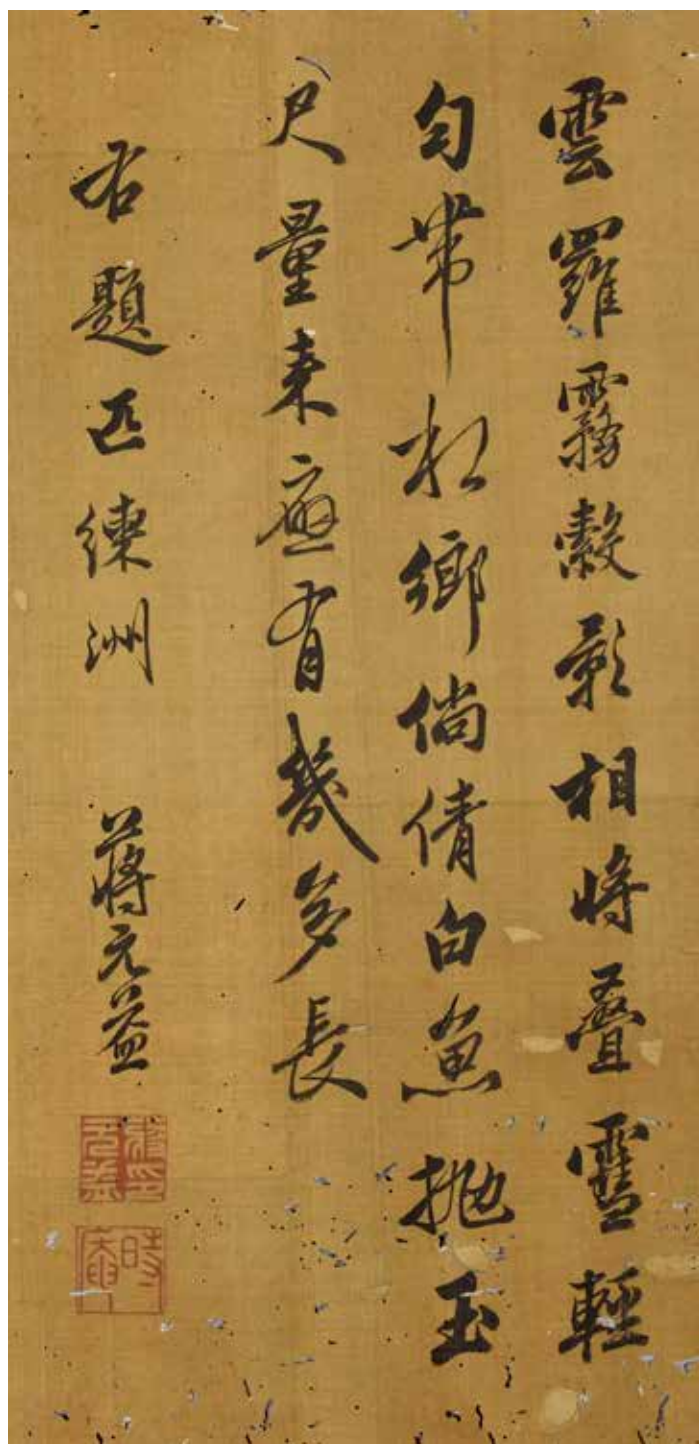


圖9 蔣元益 匹練洲 尚古集成館藏